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教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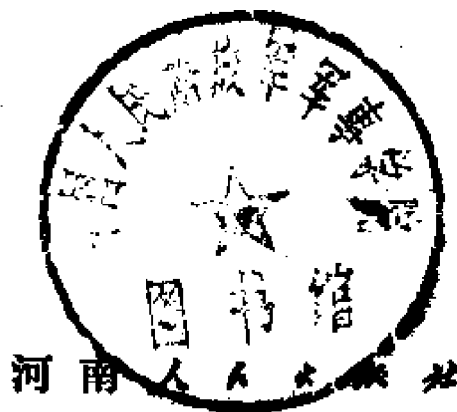
十四所高等院校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教程

河南人民出版社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教程

十四所高等院校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教程》



责任编辑

王思荣

EG12/48-28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教程

十四所高等院校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教程》编写组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信阳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075印张 108千字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860册

统一书号 2105·23 定价 0.68元

这套书的编写和出版，得到甘肃、河北、河南三省人民出版社和安徽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院校的大力支持，得到有关兄弟院校哲学教师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水平不高，编写时间比较仓促，书中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一定不少，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十四所高等师范院校编写组

1983年11月

编者说明

这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包括《反杜林论·哲学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教程，主要是提供高等师范院校政治专业教学使用的，对其它各方面从事哲学教学的教师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的同志，也会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一套适合高等师范院校政治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课教学使用的辅导教材，给教学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了满足教学需要，提高教学质量，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培养理论人材的要求，在教育部的关心和支持下，我们集体编写了这个三册一套的辅导教材。

参加编写本教程的有（按校名笔划排列）山东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武汉师范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等十四所高等院校的部分哲学教师。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曾参考了其他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辅导教材。

本套教程编写过程中，陕西师范大学刘修水、哈尔滨师范大学于恩滋、安徽师范大学方永祥、河北师范大学李殿斌等同志，作了不少组织工作。

前 言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是恩格斯全面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关系，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的重要著作；更是系统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四十年来哲学思想成果和哲学斗争经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恩格斯之所以把自己的著作题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由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虽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但它对德国古典哲学却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扬弃”。德国古典哲学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的理论来源而载入史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既是批判的继承，又是伟大的革命。但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费尔巴哈及其哲学起了特殊的特殊作用。费尔巴哈作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在黑格尔学派解体的过程中，冲破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的长期统治，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这不仅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终结起了历史性的作用，而且对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上也起了历史性的巨大的作用。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当时我们一下子都成了费尔巴哈派了，“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

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①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派。因为，费尔巴哈虽然正确地批判了黑格尔神秘主义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体系，结束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长期禁锢，但却错误地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使他的唯物主义只能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在历史观上还是唯心主义的。因此，他不仅没有彻底克服和战胜黑格尔哲学，而且就他“没有离开哲学的立足地这一点来说”，他仍然是“黑格尔哲学的支脉”（《费尔巴哈论》单行本，第32页。下同）。这样，费尔巴哈的哲学虽然消除了青年黑格尔分子在哲学路线上的一时的矛盾，却不仅没有彻底克服黑格尔哲学内在的矛盾，反而自己又陷入了新的内在的尖锐的矛盾。而且由于他“对于爱的过度崇拜”，他的哲学还成了从1844年在德国“有教养的”人们中间象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费尔巴哈离开、摆脱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走上了唯物主义的道路，并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时，便在革命实践中看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上述缺陷。因此，他们在批判地吸取费尔巴哈哲学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克服其形而上学、机械性和宗教伦理学杂质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把唯物主义同辩证法、历史观结合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崭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彻底、严整而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彻底解决了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矛盾，宣告了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所以，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费尔巴哈哲学起了“桥梁”的作用，是“中间环节”。正是这一特殊的“桥梁”作用，在革命实践的推动下，导致了德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9页。

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世，开创了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新局面。

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主题，主要是围绕如何评述费尔巴哈哲学的上述特殊地位和作用而展开的。所以，恩格斯就把这部著作题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列宁说过：“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里十分明确和详尽地叙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也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①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思想同成熟时期的思想相比，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早期思想偏重于结合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对他们先驱者思想的吸收、批判、改造；而从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1847年建立共产主义同盟之后，则主要是结合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验证、发挥和发展自己的理论。所以，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是在更加深刻、系统、全面的基础上验证、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而所论述的基本内容在其完整、准确和科学性上，在思想理论的深度上，都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第一，这部著作十分明确、详尽、科学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它的直接的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关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思想发展的必然成果；强调并论述了自然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中三个伟大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在人类认识史上所实现的伟大的革命变革。哲学是时代的产物。马克

^①《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以下引此书，均同），第442页。

恩主义哲学是它那个光辉时代精神的精华。

第二，这部著作系统地总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四十年来哲学思想的成果和哲学斗争的经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系统化，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首先，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首次提出并论述了评述哲学思潮的社会意义和历史地位，以及哲学路线的理论和方法论准则，这就是“哲学革命是政治变革的前导”和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原理。应当说，这既是哲学思潮发展和哲学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基本经验的总结，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四十年来哲学斗争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伟大成果。

其次，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十分明确、详尽、全面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观和认识论等各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及其内在的有机统一，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丰富和系统化了。这是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恩格斯特别强调，必须以严肃的态度，把唯物论和辩证法彻底地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参阅第33页），特别是运用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于是，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便从整体上，在深刻论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前提下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强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科学性，使唯物史观具备了更加完整的理论形态；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作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而载入史册。

再次，这部著作明确地论证了哲学发展的动力问题。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发展，甚至唯心主义体系内部也“愈来愈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第17页）；“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第19页）；自然科学的发展，“响起了

旧形而上学的丧钟”（第35页）等。恩格斯的这些思想，特别是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将改变自己的形式这一科学论断，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三，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异常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在实践基础上的实践性和阶级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基于上述几个基本的方面，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堪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总结性的光辉篇章，确实象《共产党宣言》一样，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在今天学习、研究这部著作，必将为我们努力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供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这部著作有一个序言、四个章节、一个结束语，外加一个极为重要的可称为本书重要内容的附录：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正文的内容来看，这部著作是运用逻辑的和历史的一致这一科学思维方法，再现了1848年革命前后德国哲学发展史的本质过程，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联系和原则区别，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基本原理。第一章所论述的内容是这一历史时期德国哲学发展的起点，所以，这一章就成了本书的逻辑起点；第二、三章评述的费尔巴哈哲学是这一历史时期德国哲学发展的“中间环节”，所以，这两章可说是本书的逻辑中介；第四章的内容是德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转折，所以，这一章也是全书的逻辑终点。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矛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得到了解决。人类思维达到了更高的理论形态。

关于《1888年单行本序言》

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写于1886年，最初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第四、五期上。1888年，经略加修改，并写了一篇序言，以单行本出版。

《序言》共有五个自然段(注)，第1至第4段，说明《费尔巴哈论》写作的历史背景和目的；第5段说明发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原因，及其意义。

一、《费尔巴哈论》写作的历史背景和目的（第1——4段）

1. 全面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对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老早的心愿（第1—2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他们的哲学创立时期，就决定要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关系，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由马克思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界限，全面论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这个

〔注〕本书自然段的计算是以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单行本为准。其计算方法，不论该段内容的长短，最后有无句号，凡句前低两格（字）者均算作一个自然段，顶格的不算。另外，凡引本书该章的引文，只用引号表示；凡引本书该章以外其它章节的，只注明页数。

心愿在“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人首次较为系统地研究、制定和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写于1845年11月至1846年4月，全书共分两卷，第一卷主要是通过“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即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唯心史观的批判来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这部著作曾准备请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商即“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尤·迈耶尔和鲁·雷姆佩尔出版。但是，由于第二卷直接批判了他们的观点，所以就拒绝承印了。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设法出版这部著作，但由于警察的迫害，和他们所反对的那些派别的代表的阻挠，始终未能如愿。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既然“自己弄清问题”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所以，这本书稿就“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从那以后四十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如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制定国际共运的战略策略、改造政治经济学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机会再回到这个题目上来。至于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还曾在某些地方作过说明，尽管无论在哪个方面说的还不够全面系统；然而，关于费尔巴哈哲学，虽然他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中间环节”，“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战线斗争的需要，又把这个问题迫切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2. 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对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思想战线斗争的需要（第3—4段）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这就是在欧洲、北美各主要国家中,资本主义不仅最终取得了统治地位,而且开始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无产阶级开始酝酿一场最后冲击资本主义制度的殊死战斗。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欧洲和北美许多国家纷纷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社会主义工人政党,马克思主义“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文明世界的一切语言中都找到了代表”。这说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已从四十年代在欧洲徘徊的一个“幽灵”,发展成为在一切文明世界各国蓬勃发展着的革命运动的实践。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各国的资产阶级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国际共运实践的高涨,预感到无产阶级革命风暴的来临,除了在政治上血腥地镇压革命力量外,还在思想上,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学说取代马克思的学说。当时,在英国和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各国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力图在“新”哲学的美名下以歪曲的形式复活早就“终结”了的德国古典哲学,以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这些国家流行起来的所谓“新黑格尔主义”和德国的“新康德主义”。

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以格林<1836—1882>、布拉德雷<1846—1924>、鲍桑葵<1848—1923>为代表)以及美国的和意大利的“新黑格尔主义者”,他们承袭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抛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他们从主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宣扬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把“绝对精神”改为“绝对经验”,认为在感觉以外没有客观实在。他们完全抛弃了黑格

尔以唯心主义形式提出的关于社会历史是有规律地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思想，从根本上排除了任何领域中客观规律性的存在。他们竭力宣扬黑格爾的反动的和保守的国家学说，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辩护。他们还宣扬个别英雄、天才人物决定历史的谬论。在德国，当时流传着各种由已经过时的哲学残渣拼凑而成的折衷主义，影响最大最坏的是“新康德主义”（以李普曼〈1840—1912〉、朗格〈1828—1875〉、柯亨〈1842—1918〉、文德尔班〈1848—1915〉、李凯尔特〈1863—1936〉等为代表）。他们在“回到康德那里去”（李普曼首先提出来的）的反动口号下，不仅竭力复活康德哲学的糟粕，“即康德哲学中最不值得保存的那一部分”，^①而且发展了康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可知论，并给它穿上现代自然科学等新的服装，以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声称唯物主义已经过时；尤其竭力歪曲和攻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它根本不是一门科学，是马克思从自己党派的政治需要臆造出来的。因此，应当“取消唯物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柯亨），给以另外的基础，这就是康德的伦理唯心主义。他们公然声称康德是工人的“导师”，是“德国社会主义之父”；并说：“在我们时代，马克思主义正处在明显的解体状态，重升的太阳康德使马克思的星辰黯淡无光。”^②新康德主义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普遍赞赏，很快就成了德国各大学中哲学讲台的霸主。此外，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还竭力诬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爾辩证法的简单拼凑，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爾的辩证法混为一谈，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以下引此书，均同），第467页。

^②《马克思还是康德》（俄文版），第5页。

根本抹杀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界限。

为了回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攻击，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提高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水平，进一步推动蓬勃发展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恩格斯越来越觉得把他和马克思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即他们怎样从黑格尔哲学出发并且怎样同它脱离，做一个简要而有系统的说明是很必要的了。

3. 全面评述德国古典哲学的直接原因是施达克对费尔巴哈的错误评价（第4段最后三句话）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丹麦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社会学家、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施达克于1885年发表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小册子，驳斥许多大学教授、讲师对费尔巴哈的诽谤和攻击。但是，他却认为“费尔巴哈是唯心主义者”。恩格斯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这说明施达克不懂得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唯物主义这一涉及划分哲学路线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真正理解费尔巴哈哲学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第18页），在那个“狂风暴雨时期”，他首先冲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体系的禁锢，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王座，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在某些方面成了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中间环节”。显然，对这样一位给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哲学家都大的哲学家，象施达克那样地评述是非常不够的，而且是不正确的。因此，恩格斯认为，说清楚费尔巴哈哲学及其所具有的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是赏还“一笔信誉债”。所以，

当《新时代》杂志编辑部邀请恩格斯写篇评论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文章时，恩格斯便“欣然同意了”。

二、发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原因（第5段）

恩格斯在把《费尔巴哈论》的单行本拿去付印以前，又重读了一遍《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旧稿。感到尽管这部著作通过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批判，清算了一下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然而其中《费尔巴哈》一章还没有，在当时也不可能达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的目的。因为，一，这一章还没有写完；二，已写好的一部分主要是研究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而且由于对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不够，以致有些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虽然已经提出，但表述还不够精确；三，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时，虽然也批判了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某些方面，但由于不是专门评述费尔巴哈，对他的哲学本身没有进行全面、集中的分析、评述、批判。

但是，在马克思的一个旧笔记本中，恩格斯找到了有关费尔巴哈的十一条提纲。恩格斯认为，这份提纲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而这又是因为，它第一次以崭新的姿态揭示了革命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基础上的有机统一，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从而不仅从整体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唯心主义、同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还为制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雏形和纲要。这就有力

地证明，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把自己的哲学思想同费尔巴哈哲学从原则上区别开来了；而且正是这一原则区别，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崭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基本观点的初步形成。

参 考 书 目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85页。

列 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7—440页。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446页。

《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76—588页。

思 考 题

恩格斯写作《费尔巴哈论》的历史背景和目的。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释

—

这一章，主要是全面评述黑格尔哲学。恩格斯在这一章里，阐述了黑格尔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阶级实质；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即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阐发了辩证法的基本思想；揭露了黑格尔哲学中方法和体系之间的矛盾，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联系和本质区别；论述了黑格尔哲学学派的解体 and 费尔巴哈哲学出现的意义。

本章有二十个自然段，可分为四个问题：

（一）黑格尔哲学的历史背景和 阶级实质（第1—2段）

任何哲学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德国古典哲学，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德国社会的产物，是德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是德国进步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1. 黑格尔哲学的历史背景（第1段）

恩格斯说，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即丹麦哲学家、社会学家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把我们带回到“准备1848年革命的时期”，也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充分发展从而产生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时期。这距恩格斯写《费尔巴哈论》一书，“不过一代之久”，然而，这两个时期的情况是多么不同。

“德国准备1848年革命的时期”，德国的资本主义虽然已经有所发展。但是，在经济上，封建的生产关系仍占统治地位，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制的残余，以及城市中的行会制仍大量存在；在政治上，整个德国还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之中，被分割成三十八个大大小小的封建王国，每个王国都有自己的税卡货币以及度量衡制度。这种封建割据状态，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经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的冲击，又削弱了德国的封建势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自从1815年以来，德国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断增长。”^②于是，提出了改变封建制度，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革命要求。但是，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非常软弱的。他们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一方面心向往之，因为法国革命后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民族的统一，为资本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3—63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03—504页。

主义的发展创造了经济的和政治的前提；但另一方面，又害怕革命所唤醒了的广大工农群众，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因而又不敢革命。它在经济上的软弱，使它无力和英法资本主义竞争，妄想依靠国家力量的支持；但又埋怨这个国家的封建束缚了它的发展。所以，德国资产阶级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和保守性。他们不是与人民群众结合推翻封建统治，而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些封建“改革者”的身上，从而与封建贵族妥协，结成了联盟去镇压人民革命。德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和德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发展的“最终体系”，在黑格尔哲学中，更集中反映了当时德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特点，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和两面性。

但是，到恩格斯写《费尔巴哈论》的1886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变而失败了，但是经过革命风暴的冲击，德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得到了发展，德国的工人运动也壮大和发展了，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建立了工人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特别是经过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年~1871年的普法战争，建立了统一的德国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使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同时，由于1848年的革命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广泛传播，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费尔巴哈及其主要理论活动已经成为过去，德国古典哲学已宣告终结。总之，1848年以后，德国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所以，后来的一代德国人对于革命前的情况感到十分陌生，“似乎已经相隔整整一个世纪了”。其实，1848年革命后所发生的一切，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仅仅是1848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

2. 黑格尔哲学的阶级实质（第2段）

恩格斯为了揭示黑格尔哲学的阶级实质及其社会历史作用，首先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评述哲学的阶级属性及其社会历史作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准则，这就是：哲学革命是政治变革的前导。恩格斯说：“正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德国哲学革命同法国哲学革命一样，都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舆论准备而载入史册的。两国的哲学革命，都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表现。“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的不同呵！”

法国资产阶级以唯物主义做革命前导，一些重要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如伏尔泰（1694~1778）、拉美特利（1709~1751）、狄德罗（1713~1784）、爱尔维修（1715~1771）、霍尔巴赫（1723~1789）等人都是一些比较激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是战斗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他们高举反对十七世纪以来的唯心主义和反宗教的旗帜，对宗教神学、封建国家制度以及一切传统的自然、社会观点都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他们既是学者，更是革命家。因此，不仅他们的哲学思想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他们的书籍遭到查禁，而且他们本人也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例如杰出的唯物主义者，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两次被押进巴士底狱。后来封建统治者烧毁了他的著作，把他赶出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利因其在《人是机器》一书中宣传了无神论而触犯了宗教神学，不仅书被焚毁，而且本人亦横遭迫害被迫逃亡到荷兰。又如“百科全书派”的主要代表，战斗无神论者狄德罗和霍尔巴赫，也都同样遭到了封建当局的迫害和监禁。

相反，德国的哲学革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反对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的性质，而抽象地和神秘地发展了被法国唯物主义所忽视的人的主体能动作用的德国哲学，复辟了历史上的唯心主义，但不是简单的复辟，而是“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①这就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随着德国社会矛盾的进展，又产生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是德国哲学革命中的一次伟大飞跃。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以此为前导的。但是，它不象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那样旗帜鲜明，而是藏头缩尾，掩掩盖盖，其革命内容隐藏在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和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因此，德国的哲学家们不但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反而被优礼相待，备受推崇。如黑格尔、鲍威尔等人，都被普鲁士王国委派为大学的教授、讲师，他们的著作成了高等学校的法定教科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甚至被推崇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

同样的哲学革命，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遭遇呢？这完全是由当时法德两国的经济、政治状况不同，和由此而来的资产阶级的不同特点造成的。

十八世纪后半期，法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比较强大，他们强烈要求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专制制度。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本阶级的统治地位，便以宗教神学做思想武器，宣传神权论、天命论，把君权和封建官僚的一切特权都归之于神的意志，要人们俯首贴耳，甘当奴隶。于是法国资产阶级要革命，要取得发展资本主义的权利，就必须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唯物主义战胜宗教神学。同时由于法国资产阶级拥有比较强大的经济、政治力量，这就使之与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

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根本不可能用妥协的办法来解决。这就决定了法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革命比较坚决的阶级，其思想家也“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用唯物主义思想武器，对封建特权、宗教神学，对专制制度进行了公开的斗争。所以，他们的哲学思想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他们的著作不能在国内出版，他们本人也遭受了残酷的迫害。

与英法相比，德国在当时是比较落后的。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没有形成一支与封建贵族相抗衡的力量，德国资产阶级不敢而且也无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与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当德国资产阶级起来进行革命的时候，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早已做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显示了自己的强大力量。德国资产阶级目睹这些情况，吓得胆战心惊。这样，德国资产阶级就处于一个十分矛盾的状态中：要革命，自己没有力量，又不敢与无产阶级结成同盟，共同进行斗争；不革命，又不能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自身的矛盾状况。这种矛盾状况决定了它对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及其精神支柱——宗教唯心主义，不敢持公然反对的态度；对现存封建国家制度不敢采取革命的行动。因而，它便把民族的统一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封建王朝的身上，在政治上走妥协改良的道路。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德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资产阶级的特性，决定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两重性。一方面，黑格尔哲学具有唯心主义和保守的特性，它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德国的哲学革命与法国的哲学革命遭遇不同。另一方面，黑格尔哲学中包含着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它反映着德国资产阶级对

于发展资本主义和改变封建统治现状的要求。这种辩证法思想，有力地冲击了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为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德国资产阶级哲学的这种革命性；他们看到的只是黑格尔哲学的保守体系为普鲁士王朝辩护的一面，因而德国的哲学革命，不仅没有遭到摧残和迫害，而且被推崇备至，被誉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

但是，当时至少有一个人在一八三三年就看到了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性，这就是德国诗人海涅（1797—1856）。海涅在其关于德国宗教和哲学的论文（1833年）中，曾明确指出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实际上是给下一代的革命做了思想上的准备，是德国未来革命的序幕。他说：“德国人的政治革命将从那个其体系常被人斥为空洞的烦琐论证的哲学发生。”^①1842年，海涅又在其名为《教义》的诗中，把黑格尔哲学，比做催醒人们进行革命的“战鼓”，认为这是黑格尔哲学中具有“最深的意义”的方面。^②

1843年海涅在一封信中谈到黑格尔“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命题时写到：“有一次，当我发现对‘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有点困惑不解时，‘哲学之王’（黑格尔—编者注）颇有点奇怪地发笑起来，并指出：要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也是指一切合理的东西都应当存在。之后他惊惶地环顾左右，而又平静下来，并相信只有亨利希·贝尔听见了他的话。”^③从海涅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海涅的确察觉到了黑格尔哲学中包含有革命的因素。

^①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974年商务印书馆，第162—163页。

^②《海涅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4—85页。

^③《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的俄译本注释，第63页。

(二) 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 辩证法发展观的基本思想(第3—9段)

1.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哲学命题及其含意(第3—7段)

恩格斯在分析、评述德国古典哲学进步的历史地位的基础上, 阐发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恩格斯是从分析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著名命题的两重性入手的。黑格尔的这一命题是在他的《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提出来的。如果把“现实的”理解为“现存的”, 而“现存的”“都是合理的”, 那末, 这一命题“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 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这自然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 也引起了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因为, 他们都不了解黑格尔这一命题的真实意义。

实际上, 黑格尔这一哲学命题是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的。他在《哲学史讲演录》和《逻辑学》中, 曾对这个命题作了比较具体的解释和发挥。他说: “凡是现实的东西就是合理的东西。但人们必须知道并区别开什么是真正地现实的东西; 在日常生活里一切都是现实的, 但现象界与现实性之间却存在着区别。”^① “就定在一般说来, 一部分是现象, 仅有一部分是现实的。在日常生活中, 任何幻想、错误、罪恶以及一切坏东西、一切腐败幻灭的存在, 尽管人们都随便把它们叫做现实。但是, 甚至在平常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1957年版第2卷, 第248页。

的感觉里，也会觉得一个偶然的存在不配享受现实的美名。因为所谓偶然的存在，只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可能的存在，亦即可有可无的东西。”^①所以“存在还不是现实的”，“……现实在自己的发展中表明自己是必然性。”^②可见，黑格尔并不认为一切现存的东西，都无条件地是现实的、合理的东西。现存的东西，只有符合必然性，合乎规律的，才是现实的、合理的。而失去必然性的现存的东西，尽管还存在着，却是不合理、不现实的，因而是行将灭亡的。所以，根据黑格尔的解释，把这一命题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时，就是说：这个国家在它是必然的这个限度内，它是现实的、合理的。如果说，在我们看来，这个国家已经不能促进反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失去了必然性，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但这个恶劣的国家仍旧能够继续存在，其原因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政府的恶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就是说由于德国臣民，尤其是资产阶级软弱无能，没有力量去推翻它，他们只能在恶劣的普鲁士国家制度下生活。然而，“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该有的政府。”

恩格斯根据黑格尔的意见，以罗马帝国代替了罗马共和国和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消灭了法国君主专制制度为例，说明“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既然任何事物的现实性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当一种事物，一种社会制度失去了它存在的必然性时，它就不再是现实的，因而也就不再是合理的了。由此，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

^①黑格尔：《小逻辑》，1980年商务印书馆第2版，第44页。

^②黑格尔：《逻辑学》，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5—166页。

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着的现实的东西”。这就是说，任何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原来现实的东西都会失去自己的必然性，成为不现实的，从而是不合理的旧事物。那时新的现实的合理的东西，即新生事物就会代替旧事物而产生。这就是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抗拒的规律。新陈代谢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恩格斯指出：“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和平代替和暴力代替是两种不同的方式，这要由事物不同性质的矛盾来决定。

恩格斯深入分析了黑格尔的著名命题之后，指出：“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存在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为，一切事物，“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即一切事物在它产生之时，已经孕育着否定自己的因素。凡在人们头脑中被正确地反映了具有必然性的客观事物，合乎发展规律的合理的东西，不管它和现有的表面现象如何矛盾，它迟早总是要取代旧的衰亡着的东西而成为现实的。这是按黑格尔辩证方法得出的基本原则，这样，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原则推论下去，“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这是由恩格斯通过对黑格尔上述著名哲学命题的分析而揭示出来的。

黑格尔的这个命题以及他对这个命题中现实性的解释，说明一切（包括自然、历史、思维）都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都是暂时的，都处在不断地发生、灭亡和无止境地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过程中，而其根源在于事物本身的必然性。这种关于整个世界辩证发展的思想，就是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①也正是这一点，体现了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

2. 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以及辩证法的基本思想（第8—9段）

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接着，恩格斯便根据黑格尔的辩证发展的思想，论述了人类认识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法。首先，恩格斯指出，人类的认识是一个无限的辩证过程，真理包含在认识过程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人们的认识愈升愈高，但永远也不能穷尽所谓绝对真理。人类社会也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辩证过程，是一个不断地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前进、上升的运动；在这个不断地前进、上升的过程中，每一阶段的产生和灭亡都是必然的，因而每一历史阶段的存在都是暂时的，每一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产生和灭亡的条件都存在于这个社会的内部，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

在分析了人类认识和社会发展的辩证性质的基础上，恩格斯阐发了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及其对人类思维方法的意义。恩格斯指出：“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1页边注。

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人类实践和科学发展的成就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客观事物的辩证发展，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便形成了辩证发展的世界观。也就是说，主观辩证法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

辩证法把一切都看成是无穷无尽的变化发展的。但是，恩格斯说：辩证法“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这就是说，事物不仅有质变、飞跃，而且也有量变、相对的静止。这是区别事物的重要条件，是认识的基础，也是事物赖以分化的基础。但是，在辩证法看来，这种静止和稳定只不过是绝对运动的一种特殊状态。

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而自然科学却预言了地球发展是有末日的，就是说地球早晚总有一天要毁灭。因此，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也有下降的过程。那么，这是否说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相互矛盾呢？恩格斯说，我们现在距离地球毁灭与社会历史下降的转折点还相当远，所以这里没有必要研究这个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要求黑格尔哲学去研究当时还根本没有被自然科学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具体的东西都是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地球及其生活在上面的一切生物总有一天要毁灭，但这并不等于整个宇宙就不存在了，宇宙还是仍然在运动、变化和发展着。因此，自然科学的预言不仅与辩证法的基本思想没有矛盾，相反，却恰好是辩证法的正确性的证明。

（三）黑格尔哲学方法和体系之间的矛盾

（第10~12段）

1. 保守的体系闷死了革命的方法（第10—11段）

黑格尔哲学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是，对于这一哲学思想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黑格尔本人不仅从来没有明确地阐述过，反而得出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这是为什么呢？恩格斯指出，这是因为黑格尔的方法和体系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按照当时德国的传统，哲学家必须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穷尽一切的绝对真理体系，不然就不能算是一个哲学家。黑格尔就是按照这个传统习惯建立自己庞大的哲学体系的。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一切都是发展的，一切发展都是没有止境的，但是，黑格尔又不得不承认发展有个终点，并积极地去追求这个终点。为了建立一个永恒不变，最终完成的绝对真理体系，他就不得不创造一个纯粹的、完善的绝对的东西，它既是体系的起点，又是体系的终点。这个“绝对”的东西，用哲学的语言说，就是“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是非常庞大的。他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之前，已经存在着一种既不依赖于人，又不依赖于自然界的所谓宇宙精神，黑格尔称之为“绝对观念”。这种“绝对观念”是唯一真实存在的东西，它是整个宇宙的基础，是一切存在的源泉。显然，这种被称之为派生一切的“绝对精神”不会是别的，它只能是上帝的代名词。因而，从本质上讲黑格尔的哲学，只不过是披着哲学外衣的宗教说教。

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变化发展的。它的发展过程分为逻辑、自然、精神等三个阶段。其中逻辑阶段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第一阶段，在逻辑阶段里，地球、自然界还没有出现，这时的“绝对精神”是作为超时空、超自然、超社会的纯粹观念而存在着、发展着的。当“绝对精神”发展到了某一顶点时，就突破纯粹思维的范围而“外化”为自然界，进入“绝对精神”发展的第二阶段，即自然阶段。在自然阶段中，“绝对精神”体现为自然界而发展，当自然界发展到出现人的时候，“绝对精神”就超出了自然阶段而进入第三阶段即精神阶段。在精神阶段中，“绝对精神”体现为人类社会而发展，体现为人的意识和社会意识，并最后在黑格尔哲学中完成了自我认识，又回复到了原来的出发点——“绝对精神”自身，从而结束了“绝对精神”的全部发展过程。黑格尔的《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就是分别说明“绝对精神”在“逻辑阶段”、“自然阶段”和“精神阶段”的发展状况的。

这样，尽管黑格尔在《逻辑学》中非常强调发展，并强调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要让发展有个终点，使过程有个完结，不然他就无法完成他的体系。显然，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体系。之所以说是唯心主义的，这是因为他所讲的发展主体并不是客观世界本身，而是某种神秘的“绝对精神”，他讲的发展过程并不是客观世界按照自身规律的发展过程，而是绝对精神以各种概念的形式按照黑格尔正反合的公式逻辑的推演过程。之所以说是形而上学的，是因为他所谓的“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个无限前进的过程，而是一个循环闭锁的圆圈。

恩格斯指出：“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

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

首先，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发展是普遍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则认为只有“绝对精神”才是真实存在的、真正发展的，至于自然界和社会本身不仅不是运动发展的，而且还不是真实存在的，人们所见到的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只不过是“绝对精神”发展变化的外部表现而已。

其次，黑格尔的辩证法还认为，一切发展都是无限的，没有终点的。可是，黑格尔形而上学的体系却认为“绝对精神”的发展有一个终点，这个就是黑格尔哲学。“绝对精神”经过逻辑阶段、自然阶段和精神阶段，最后在黑格尔哲学中实现了自我认识，达到了认识的顶点，因而也就结束了它的发展的整个过程。

再次，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矛盾斗争是一切发展的基础，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体系却认为，矛盾斗争只存在于具体的、“有限之物”中，而在“绝对精神”中，一切矛盾都要调和起来。

由于黑格尔的保守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体系和他的进步的、革命的、关于运动发展的辩证法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而方法又必须服从于体系的需要，所以，体系最终淹没了辩证法，致使革命的方面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闷死了。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和他的社会历史观点是一致的。既然人类的认识的发展、哲学的发展要有一个终点。那么，人类的历史的发展相应的也必须有一个终点，既然黑格尔宣布在他自己的哲学中已经实现了“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他的哲学是哲学发展的终点，那么，这就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已经达到了能够把这个“绝对精神”变为美好现实的地步。因此，黑格尔就不必向他

所处的时代提出太高的实践的政治要求。所以，他在《法哲学》一书中宣布，哲学的最高原则即“绝对精神”，——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所许诺的等级制君主立宪政体里得到实现，普鲁士国王许诺的君主立宪制一旦实现，人类历史的发展便达到顶峰。恩格斯指出：这样，黑格尔在这里就用思辨的方法给我们证明了贵族的必要性。

为什么具有辩证思维方法的黑格尔，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竟得出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呢？这是有阶级根源的。

黑格尔在哲学领域中，本来是众神之王（宙斯），他远远超出他的先驱者，提出了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成为一个伟大的辩证法大师。但是，他是作为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必然要反映到黑格尔的哲学中来，这就决定了不能从他的辩证法引出当时德国社会制度必然走向灭亡的结论来。所以恩格斯说，黑格尔和歌德一样，尽管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有很大成就，但在政治上都是庸人，都拖着一根庸人辫子，没有摆拖庸人气味，都否认对当时德国社会制度实行根本变革的必要。

2. 黑格尔哲学的成就及其意义（第12段）

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是唯心的，保守的。但是，他们巨大成就及其在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还是必须予以肯定的。

第一，他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以往全部哲学的发展：他的哲学“包括了以前的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巨大领域”和“丰富思想”。黑格尔的哲学包括精神现象学、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等，而精神哲学又分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许多不同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黑格尔以其广博

的学识“发展了现在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考察了个人意识发展的各个形态和各个阶段，分析了人类意识发展的历史过程。但是，它是离开社会存在，在纯粹思维的范围内去说明意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它是唯心主义的，是本末倒置的。然而，在此唯心主义外壳里边，却包含有合理的东西，这就是黑格尔在描述人类意识的历史发展时，猜测到了意识产生和发展的一些真实情况，如婴儿感情意识在先，抽象思维在后的情况等，这实际上是人类意识产生、发展的缩影。《逻辑学》是黑格尔整个体系的基础。它描述了“绝对精神”在体现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前，作为纯粹抽象的逻辑概念自我发展的过程。从而说明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以及形式逻辑的一些问题。在《自然哲学》中，黑格尔利用大量自然科学材料，说明自然界中无机物的联系变化情况。在《精神哲学》中黑格尔用大量的社会材料和历史材料，说明社会历史领域中法、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等具体问题。由此可见，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包含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它确实是以往任何哲学体系所不能比拟的。当然，为了完成体系，为了把大量的科学知识组织到自己的体系中来，黑格尔不得不求救于他的正反合三段论式“强制性结构”的帮助。这些结构，是黑格尔为了建立体系而首先建立起来的。很多黑格尔的渺小敌人，如折衷主义者杜林，庸俗唯物主义者摩莱肖特等人，根本不理解黑格尔哲学，只看到一些黑格尔哲学的皮毛便大肆攻击，其实他们攻击的只是黑格尔庞大哲学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黑格尔哲学中无数具有充分价值的珍宝却在这个哲学大厦里边。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才把这些珍宝发掘出来，使之得到革命的改造。

第二，黑格尔哲学的另一个成就就是：正是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这一珍宝”，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这就是说，哲学家们不要追求那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体系，而应当根据社会发展的现有条件去发现那可能达到的相对真理。“体系产生于人的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这是旧哲学普遍存在的情况，是以往哲学家的主观愿望，但这却是虚妄的。因为，妄图一下子永远解决一切矛盾，达到终极的绝对真理，结束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极其荒唐的，并且是永远办不到的。因此，反映这种虚妄愿望的“体系”也就无法长期维持下去，所以，只能“是暂时性的东西”。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使我们了解到，给哲学提出建立体系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这是任何哲学家都无法办到的。这是一个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这样，建立终极真理体系的旧哲学，便从此终结了。所以，人们必须放弃追求建立那种不可能的绝对真理的哲学体系的妄想，“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

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的巨大成就和重要意义。黑格尔哲学是旧哲学所能达到的顶峰。由于黑格尔哲学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以及他的深刻的辩证思维方法，就结束了全部以往所理解的旧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崭新的哲学，它从来不把自己当作包罗万象的科学之科学；它也反对建立一个所谓绝对真理体系的迷宫从而把自己封闭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远是发展的科学，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发展，根据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远不断地发展和丰富着自己。

（四）黑格尔学派的解体 and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第13—20段）

1. 黑格尔学派的解体（第13—16段）

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和方法之间矛盾的暴露和解决，就是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则是它们之间的中间环节。

由于黑格尔哲学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给当时的德国以强烈的影响，当黑格尔还在世时，就已经享有巨大的声誉；到1831年黑格尔去世，直到1840年这一时期，他的哲学，影响到了各个领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黑格尔主义’的独占统治达到了顶点”。各门科学，例如辩证法、逻辑、历史、法律、美学、哲学史、宗教等等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甚至通过通俗读物和报纸渗透到普通知识分子中间去了。但是，黑格尔哲学的“这一全线胜利仅仅是一种内部斗争的序幕罢了”。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下半期，黑格尔哲学在德国的统治达到顶点之后，就开始解体了。

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归根到底是德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所决定的，尤其是德国社会经济、政治矛盾日益激化的反映，是激进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官僚君主专制的理论表现。

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是黑格尔学派解体理论上的原因。因为，这种矛盾在黑格尔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当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时候，必然给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都留下了广阔的场所。于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社会矛盾

的展开，黑格尔学派围绕着当时德国最有实践的意义的宗教和政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黑格尔学派首先分裂为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是左翼，老年黑格尔派是右翼。

所谓老年黑格尔派，以辛里克斯（1794—1861）等为代表，他们特别重视黑格尔哲学的体系而完全抛弃了他的辩证法。他们把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同基督教的上帝完全等同起来，认为黑格尔哲学无非是一种理性形式的基督教神学；在政治上，他们维护普鲁士王国的反动统治。

青年黑格尔派以施特劳斯（1803—1874）、鲍威尔（1809—1882）和施蒂纳（1806—1856）等人为代表，费尔巴哈也属于这一派。青年黑格尔派不大重视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他们否定了黑格尔的神秘的超人类的“绝对精神”，他们提倡人的“自我意识”，反对封建制度，要求个人解放。青年黑格尔派比较重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力图从这里做出无神论和革命的结论。在宗教问题上，他们批判上帝创世说，甚至根本不承认耶稣的存在；在政治上，他们反对等级制度和封建专制政体，主张政教分离。因此，青年黑格尔派无论在政治上或宗教上都属于极端反对派。

在对待宗教和政治问题上，青年黑格尔派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转变过程。在三十年代末，他们对当前的紧迫问题采取了超然的态度，因而他们的学说得到了政府的宽容、甚至保护。但是，到了1840年威廉四世上台以后，随着反动统治的加强，迫使人们公开站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了。这时，青年黑格尔派便不再为了抽象的哲学目的而进行争论，而是已经直接提出了要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国家了。1842年，青年黑格尔派直接作为激进的资产阶级代表出现，转入了公开的政治斗争。他们虽然依旧披着哲学的

外衣，但只不过是為了掩盖书报检查机关的耳目罢了。

青年黑格尔派内部的思想分歧，是黑格尔学派解体的一个侧面。当时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宗教和政治。但“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青年黑格尔派虽然是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代表，但仍然带有根深蒂固的软弱性，不敢把斗争的主要方向放在政治上，所以主要的斗争表现为反宗教的斗争。

青年黑格尔派的施特劳斯和鲍威尔都反对宗教神学，都对基督教进行了批判，都认为福音故事是荒诞无稽的东西。但是，他们在福音神话是如何产生的问题上，由于见解不同而展开了争论。

黑格尔曾说过，圣经中的故事必须和世俗故事同等看待。施特劳斯在1835年写的《耶稣传》中，遵从黑格尔的意见，认为对圣经中的故事要加以正确地、历史地考察，不应简单地否定。施特劳斯认为，《福音》中关于耶稣的传说，虽然不是什么神，但他很可能是在历史上曾经真正存在过的历史人物，他的思想和活动被人们记载下来，一代一代传到现在，就成为今天的福音全书了。因此，施特劳斯认为，《圣经》中关于耶稣的传说是基督教早期信徒们无意识的集体创造的结果，是宗教团体共同意识的产物，不是某个人主观“自我意识”的产物。

鲍威尔反对施特劳斯的观点，在1840年和1841年先后写了《约翰福音批判》和《基督福音汇编批判》两本书。他认为，《圣经》中关于耶稣的传说完全是无稽之谈。他认为，耶稣不但是神，而且也不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至于福音故事，那完全是作者为了某种宗教目的而有意识地编造出来的。

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的争论，后来便引申、发展为什么是世界历史的动力问题的争论。由于施特劳斯主张《圣经》中关于耶稣

的神话传说是很多人无意识的集体创造的结果，所以他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一种精神“实体”，即国民精神或民族精神。鲍威尔反对这种观点，由于他主张《圣经》中关于耶稣的传说是个别人有意识的编造出来的，所以他主张社会发展的动力是“自我意识”，只有具备批判思维能力的杰出人物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我们知道，黑格尔曾以唯心主义的神秘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猜测到了历史的规律性和个别人物活动之间的关系，论述了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问题。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则片面发展了黑格尔哲学的某一方面，这无疑是一种倒退。

最后，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出现了施蒂纳。他发展了鲍威尔关于杰出人物决定历史发展的思想，并把它极端化了。施蒂纳于1845年出版了《唯一者及其财产》一书，狂热地宣扬无限制的个人自由的无政府思想。他认为，在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既不是“实体”，也不是“自我意识”，而是个人，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的我”。所以恩格斯说：“他用他的至上的‘唯一者’压倒了他自己的‘自我意识’。”施蒂纳的这种观点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个回光返照。从此之后，青年黑格尔派就结束了它的生命，而变得无声无息了。

在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中，还有一些青年黑格尔派分子，由于弄不清黑格尔哲学而长期苦恼。究竟“绝对精神”怎样通过自己的“退化”发展，而把自己“外化”为自然界最后“外化”为人类社会呢？这些问题长期弄不清楚。随着事态的发展，在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中，有一部分坚决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在反宗教的斗争实践中走上了唯物主义道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就是费尔巴哈。这是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中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

因为不论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争论，还是青年黑格尔派内部的争论，都没有超出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范围。只不过，老年黑格尔派强调的是黑格尔哲学的体系，青年黑格尔派则抓住了黑格尔的方法。而青年黑格尔派内部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争论，也是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进行的。后来施蒂纳的出现也只不过意味着有一小部分青年黑格尔派，又进一步从主观唯心主义走上了唯我主义的荒谬道路。而费尔巴哈则冲破了黑格尔的体系，不再把自然界看作是从“绝对精神”或其他某种精神中派生出来的第二性的东西，而把它看作是客观的、唯一现实的、第一性的东西，意识则是在物质长期发展过程中产生，并被物质决定的第二性的东西。这就宣布了唯物主义的胜利。

2.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及其意义（第17—18段）

正当一部分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在反对宗教的斗争中，对一系列问题困惑不解、不知所措的时候，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了。“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为有力地反对现存宗教的斗争开辟了道路，对当时的社会特别是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发表于1841年。在该书中费尔巴哈公开宣称，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人或神的客观实在，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类赖以存在的基础、自然界和人是唯一的真实的存在，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神只不过是对人的本质的虚幻的反映，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由于《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宣传了唯物论，批判了唯心主义，揭露了宗教的神秘外衣，批判了上帝创世说，所以，正如恩格斯所说，它在当时德国的思想界起了巨大的“解放作用”，它使人们的思想豁然开朗。一下子

从几十年来黑格尔哲学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连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很兴奋，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但是，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也从来没有做过纯粹正统的费尔巴哈派，而是通过费尔巴哈又摆脱了费尔巴哈，最后，又大大超过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只是“中间环节”。

费尔巴哈对当时的影响是强烈的。“甚至这部书的缺点也加强了它的一时的影响”。这本书有两个缺点：第一，以华丽、形象和夸张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论证；第二，是对“爱”的过分崇拜。为什么说这两个缺点也加强了它的影响呢？这是因为，长期统治德国的黑格尔哲学，其内容抽象艰深，文字晦涩难懂，读起来令人头痛，使人望而生畏。而费尔巴哈一扫过去的恶劣文风，不仅道理简明深刻，内容通俗易懂，而且行文流畅，词藻华美，例证生动，十分有感染力，读起来令人意趣横生，因而“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所以，他的笔调虽然过分夸张，使人感到华而不实，但比起黑格尔的刻板文章来，显然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至于对于“爱”的过度崇拜，也是如此。在阶级社会里，无视严酷的阶级斗争，过分夸大“爱”的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对于黑格尔的不合情理的“绝对精神”的长期统治来说，却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封建专制和宗教的长期统治下，人们的感情关系被压抑到了最低限度。而黑格尔的哲学又是一种“纯粹思维”的专制，不讲任何一点感情之类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费尔巴哈宣扬的“爱”，也是对他们的消极反抗，它投合了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温情脉脉的心理，因而也受到欢迎。所以恩格斯指出，对这两个缺点，虽然不能加以辩护，但却是情有可原的。恩格斯又特别指出：“我们不应当忘记，从1844年起在德国的‘有教养的’人们中间象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把费尔

巴哈的这两个弱点当做自己的出发点的。”它用纯粹空洞的、夸张的词藻去代替科学研究，鼓吹“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反对用经济和政治的改革，“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一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它予以严厉的批判。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是1848年革命前法国小市民利益的思想反映，是保存小资产阶级的要求。而“保存这个小资产阶级，就是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因此，在1848年革命时期，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十分欣赏“真正的社会主义”，把它用做“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①1848年的革命风暴已经把这个可恶的流派一扫而光。

3. 对黑格尔哲学应持的态度（第19—20段）

恩格斯指出：“还有一点不应当忘记，这就是：黑格尔学派虽然解体了，但是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批判地克服”。因为象费尔巴哈那样用全盘否定的态度来对待包含有丰富的积极成果、对民族精神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是制服不了这种哲学的。所以，恩格斯说：“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根本的问题是，“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这个任务由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抛弃了他的唯心主义形式，把辩证法放置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从而在人类认识史上实现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9页。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以前的一切旧哲学都失去了它的意义而全部终结了。而1848年的革命实践，不仅扫除了黑格尔关于普鲁士王国是社会发展顶峰的观点以及费尔巴哈关于“爱”的种种说教，把他们的哲学抛在了历史车轮的后边，正象费尔巴哈把他的老师黑格尔抛在一边一样，而且连费尔巴哈本人也被时代毫不客气地挤到后台去了。

参 考 书 目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1—23页。

列 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3—584页。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5—279页。

思 考 题

1. 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阶级实质。怎样理解哲学革命与政治变革的关系？
2. 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是什么？如何理解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
3. 如何理解黑格尔哲学方法和体系的矛盾？
4. 费尔巴哈哲学产生的意义是什么？它为何不能制服黑格尔哲学？

二

恩格斯在第一章里全面评述了黑格尔哲学，第二章和第三章

则是全面评述费尔巴哈哲学。因为费尔巴哈哲学在某些方面，曾是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间环节。第二章主要根据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分析评述了费尔巴哈的自然观，阐明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揭示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及其根源。第三章主要分析、批判费尔巴哈的历史观，揭示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实质和根源。

本章共有二十八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问题：

（一）哲学基本问题（第1—7段）

为了正确评价费尔巴哈哲学，批判施达克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混乱，恩格斯在这一章里，首先全面论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从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对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是恩格斯总结人类认识史，总结他和马克思四十年来哲学斗争经验，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得出的科学结论。恩格斯从它的产生、提出及其内容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和逻辑的分析。

1. 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根源和提出（第1—2段）

哲学基本问题是个古老的问题，到恩格斯作出科学的概括时为止，它基本上经历了远古的、中世纪的和近代的三个基本阶段。

在原始社会的初期，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这时，人类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既不可能知道人的身体结构，更无法正确解释

睡梦这种复杂的生理现象，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念：认为人有灵魂，它寄存于身体之中，思想和感觉就是灵魂的活动。人睡觉的时候，身体停止活动，灵魂却在梦中活动；到人死后，灵魂便离开身体到别处活动，这说明灵魂是不死的。由于灵魂被想象为一种脱离肉体的精神，因而人们也就不得不思考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以及灵魂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就是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原始形式之一，也就是哲学基本问题的萌芽。

灵魂不死观念的产生，最初并不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抵抗的命运，一种真正的不幸。在古希腊人那里，他们不知道人的肉体死后，活着的灵魂究竟怎样，认为死后的灵魂将为其生前的行为受到某种报偿或惩罚，而报偿是靠不住的，惩罚是难以避免的，所以，具有强烈的自发唯物主义的希腊人，便“把人世生活看得比冥土生活宝贵得多，……宁可把死后的永生看做是一种不幸。”^①

除此之外，当时，人们还思考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自然力是受什么东西支配的？那时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几乎完全束手无策，对于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不理解，于是便把灵魂不死的观念，推广来解释自然现象，把凡是能引起一定变化的自然力，都看成与人一样，具有意识、需要、爱好、希望和意志的精神东西，比如雷有雷公，电有电母，风有风婆，山有山神，水有龙王等等。各种自然力各有自己所管辖的领域，这些自然力所引起的现象，都是它们有意识活动的结果。这样一来，种种自然力被人格化为神，形成了万物有灵的观念，产生了最初的神。由于人们的生活同周围自然物的关系较为密切，于是也产生了最初的“图腾崇拜”。这就是原始的多神的宗教。自然力人格化，是思维和存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42页。

关系问题的另一种原始形式的表现。

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到社会产生了阶级，握有无限权力的君主出现以后，人们便联想到诸神之中也会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万能的神。整个世界都是由这个神主宰和创造的，因此，从许多神中抽象出了一个全知全能的神。这样，就由多神教演变为一神教。神是否创造世界的问题，实质上就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
关系问题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这样，我们便可看到，“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象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虽然根源于远古时代，但在那时，还认识得不清楚，也很不自觉。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占绝对统治地位，哲学成为脱离实际，脱离人民，关在神学院里对基督教圣经进行繁琐论证的经院哲学，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于是，“世界是神创造的”成了神圣不可侵犯、不容置疑的教条，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已被认为用神秘主义的唯心形式解决了。因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不可能被明确地提出来。

即使是这样，人们还是以曲折迂回的方式提出了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就是经院哲学内部展开的唯名论和唯实论的斗争。唯实论也叫实在论，在当时教会中占据统治地位，是宗教和神学的卫道士。它强调一般的宗教教条是真实的，认为概念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只有一般概念才是存在的实体。相反，唯名论是某种程度的离经叛道者。它强调个别事物的实在性，认为个别事物先于概念而存在，一般概念不过是事物的名称。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说，中世纪的唯名论，尤其是到了欧洲封建社会走向衰

亡的前夕，在英国出现的唯名论，实际上是比较明确地承认了自然界是世界本源的问题，因而可以说是近代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唯名论和唯实论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的，还是自然界？”这仍然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跳出神学的范围，是以争论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形式反映出来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中世纪唯名论者同实在论者的斗争和唯物主义者同唯心主义者的斗争具有相似之处。”^①这场斗争，促进了经院哲学的瓦解，为近代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的发展作了准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它“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

从十四世纪末到十六世纪，欧洲进入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摆脱封建宗教神学的束缚，推动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反映在哲学上就是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同宗教神学的对抗。只有到这时，人们才从长期冬眠中日益觉醒，以尖锐的形式向教会提出了挑战：“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从此以后，关于世界的本原问题，就作为科学与宗教相对立的两条路线，被近代唯物主义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的发展，促使哲学愈来愈注意研究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于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也被提到十分突出的地位。这样，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以逻辑的范畴，完整的哲学形态作为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即不仅作为本体论，而且作为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被尖锐地提出来。于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

^①《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5页。

2. 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第3—6段）

恩格斯在对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了历史的考察之后，接着便从理论原理上作了详尽地分析，指出它的内容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即思维 and 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全部哲学斗争虽然错综复杂，但都是围绕着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1）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和对唯心主义的批判。

恩格斯指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认识问题即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是哲学的最高问题。最高问题是指，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中，谁决定谁，谁是世界的本原的问题，是任何哲学家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是决定哲学路线方向的问题。根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识别哲学派别的本质。因此，它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恩格斯说：“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所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除此之外的任何解释，都将导致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混乱。

唯心主义阵营包括有各种各样的派别，最主要的有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两大派别。它们都认为精神是世界的本原，思维先于存在，精神先于物质。由于它们对精神的说法不同，一是讲客观精神，一是讲主观精神，所以才有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区别。在它们之间也发生过一些争论，但“在唯物主

义者看来，这将是信黄鬼的人和信绿鬼的人之间的争论。”^①

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本质是一样的。比如在基督教那里，上帝是万能的，世界是神创造的。这种创世说当然是荒唐的。但是它比较直接了当。可以说是一种粗糙的、欠缺雕琢的唯心主义。而“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黑格尔认为，现实世界是“绝对观念”创造的，“绝对观念”创造自然界和社会，是逐渐完成的，依次“外化”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玩弄了一番抽象的思辨，转了好多个弯，其实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世界是思想创造的。因此，黑格尔哲学可以说是一种理论化了的精致的宗教神学，它比基督教显得更为混乱，更为荒唐。费尔巴哈也看出了这一点，他说，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不过是哲学范围内的宗教残余。

唯物主义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也有不同的学派，主要有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们在回答世界本原问题上完全相同，都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都主张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物质是不依赖于精神而独立存在的。

历史上的哲学派别虽然名目繁多，但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以解决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哲学路线和哲学内容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因此，都可以按照这个标准，划分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阵营，这就是后来列宁所提出的哲学上的党性或党派性。当然，哲学上两个阵营之争，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是公开进行的。有的哲学家妄想躲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自命为哲学上的中间派，其实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

^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278页。

比如欧洲十七世纪二元论哲学家笛卡尔，主张心物各自独立，互不依赖，是两个平行的本原。但最后，他又主张心物这两种“实体”的创造者是上帝，还是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这说明，只要是彻底的哲学，都主张一个本原，不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就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二元论者玩弄模棱两可的手法搞折衷主义，动摇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正是哲学上缺乏勇气，不彻底的表现。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因而是哲学的最高问题；但还不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全部，因此，不能用它来代替甚至取消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基本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重要方面。

（2）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和对不可知论的批判。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概括起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即世界的可知性的问题。这是从意识的来源上，从能否认识、能否正确认识世界的问题上来揭示思维、意识的本质，揭示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对这个方面的不同回答，可以划分为各种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凡是这样或那样承认思维和存在同一性，肯定思维和存在彼此联系和互相转化的，就是可知论者。凡是以某种方式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就是不可知论者。

恩格斯指出：“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列宁解释说：“在这里所指的不仅是所有的唯物主义者，而且也包括最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例如，绝对唯心主义者黑格

尔。”^①

黑格尔对世界可知性问题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在他那里，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他的“绝对精神”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逻辑阶段、自然阶段、精神阶段。从逻辑阶段经自然阶段到精神阶段的转化，就是思维转化为存在，存在又转化为思维的过程。这就是黑格尔所主张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它的实质就在于“绝对精神”能够认识“绝对精神”。黑格尔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起“绝对精神”的唯心主义体系的。黑格尔认为，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作为“思想内容的内 容”。所谓“思想内容的内 容”就是指“绝对精神”。因为在黑格尔那里，我们在现实中所认识的，不是现实世界的本身，而是它的思想内 容，即隐藏在现实世界后面的概念，现实世界是绝对精神通过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过渡，而逐渐实现出来的东西。在实现以前，不仅“绝对精神”早就存在，而且概念也已经作为纯概念（即“绝对精神”的逻辑形式）而存在了。黑格尔把现实世界看作现象、外在形式，把纯概念看作是本质、思想内 容，而“绝对精神”则是纯概念的最后本质、最深刻的内 容，即“思想内容的内 容”。在黑格尔看来，思维是“绝对精神”为了认识自己而产生出来的，因此，它是可以认识“绝对精神”的。这样，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本来是需要证明的，可是在黑格尔那里，这个需要证明的结论，已经默默地包含在他的前提里面了。

黑格尔是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他之所以承认世界是可知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他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一样，都有个“幻想”。因为对他的思维来说，他的哲学是对现实世界的正确认识，并且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正确认识，而达到对“绝对观念”的正确

^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89页。

认识。所以他的哲学是唯一正确的哲学，是符合世界的真理，是代表世界本质的理性和正义的。因而，要把这种哲学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按照他的原则改造全世界，就能实现世界和真理、理性、正义的和谐一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会得到证实。至于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黑格尔认为是不存在的，当然也谈不到对它的认识问题。可以看出，黑格尔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用“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来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

但是，还有一些哲学家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作了否定的回答。他们不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这样，他们就从问题的这一方面割裂、歪曲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歪曲了思维、意识的本质。

在近代哲学中，休谟和康德是不可知论的主要代表。休谟认为，人的认识只限于感觉的范围之内，至于感觉的来源，根本无法知道，而在感觉之外的客观世界，不仅不能认识，连它是否存在，也是不可能知道的。康德虽然承认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自在之物”，但又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只能认识“现象世界”，不能认识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即“自在之物”。

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角度，用辩证的观点批判过不可知论。黑格尔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只有在实践和认识的过程中去检验，而不能象康德所理解的那样，在认识以前先去检验认识能力。他又认为，现象和本质是辩证的统一，本质并不是在现象之外，而是存在于现象之中，现象是本质的表现。因此，人们透过现象，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质。但是黑格尔对现象和本质的理解是唯心的。他把实践看作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环节，

把思想、概念理解为本质，而把物质、存在看作思想、概念的表现或现象；是由思想、概念派生出来的。所以恩格斯说，黑格尔抓住了不可知论的要害，说出了具有决定性的东西，黑格尔对不可知论的驳斥是深刻的，但是他只说了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东西，这是黑格尔的可知论的局限性。

费尔巴哈对不可知论的批判，附加了唯物主义的东西，他是从感觉论的角度批判不可知论的。费尔巴哈认为，康德说的“物自体”是一个不依我们的感觉而存在的客观世界，它与现象世界（即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没有任何原则差别。“物自体”是完全可以被我们认识的物质世界，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个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比如盐味是盐的客观特性的主观映象。他认为，人之所以能够认识外部世界，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本身及人的感官是物质世界的产物，和物质世界处于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因此，人的感官并不存在阻止外部世界进入人体内部的障碍。他有一句名言：“人的感官不多不少，恰合在世界的全体中认识世界之用”^①，即具有使人从世界的完整性、整体方面来感知世界所必需的感官。他还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然而，由于费尔巴哈不懂得实践的意义，不懂得辩证法，总是用生活的直观来说明第二方面的问题。所以，恩格斯说：他“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

无论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还是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都没有彻底驳倒不可知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用科学的实践观，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才彻底驳倒了不可知论。恩格斯说：“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在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中，能够制造出某一自

^①《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第630页。

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需要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

恩格斯用提炼茜素和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被证实为例，论证了这一问题。实践说明，世界上根本没有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差别只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随着实践的发展，现在暂时未被认识的东西，将来一定会被认识。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在科学的实践观的基础上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

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驳倒了不可知论。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德国和英国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力图复活康德和休谟的观点，出现了新康德主义和新休谟主义。德国的珂亨、朗格、李普曼、黑尔姆霍兹等人，在“回到康德去！”的反动口号下，力图复活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和折衷主义，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以此来反对唯物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企图将工人运动引入歧途。英国的斯宾塞、赫胥黎等，他们力图复活休谟的观点。在这些资产阶级学者中，有许多是自然科学家，如赫胥黎就是一位英国的生理学家、达尔文学说的支持者和宣传者。黑尔姆霍兹是一位德国的生理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内，实际上是自发的唯物主义者，但在口头上却拒绝唯物主义，宣称自己是不可知论者。所以恩格斯说：“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而在实际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做法。”

从恩格斯对不可知论的分析判断中可以看出，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回答，不仅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对立，而且在可

知论中，又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可知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可知论的根本区别。这些复杂情形表明，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回答是回答第二方面问题的出发点和前提。由于对第一方面的理解中，不仅有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还有“怎么样”的问题，所以，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还同时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

综上所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古老的问题，既是人们生活和实践中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就是解决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也是任何哲学家都不能回避而必须首先回答的基本问题（全部哲学的范畴、原理、理论体系都是从这里发端的）。恩格斯在总结人类认识史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是理论思维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它为我们研究人类思维发展史，提供了指导性的线索；为我们识别哲学派别、评述哲学路线，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武器；为建立科学的哲学和哲学史奠定了一块重要的基石；也是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南。

3. 哲学发展的动力（第7段）

恩格斯指出，社会实践不仅是驳斥不可知论以及其他一切哲学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武器，而且也是推动哲学发展的动力。他说不论是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唯心主义哲学，还是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的近代唯物主义哲学，推动哲学家们前进的，不是纯粹思想的力量，“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在这里，恩格斯揭示了哲学发展与自然科学、工业进步的

关系，论证了实践是哲学发展的动力，实际上是从问题的这一方面，论证了科学的实践是解决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基础。因为，唯物主义甚至唯心主义也力图概括工业生产的新经验和科学发展的新成就，而这也就是概括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经验，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各个领域内的表现和规律。

由于唯物主义在本质上与工业的进步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一致的，因而，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英、法两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工业生产的新经验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都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学说。近代唯物主义是在同封建的宗教神学作斗争中成长的，它反映了自然科学和工业为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而求得自身发展的需要，也反映了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因此，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发展，不仅是对唯心主义虚伪、荒诞无稽的有力揭露和批判，对唯物主义正确性的科学论证，而且也是推动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强大动力。

从近代唯心主义的发展来看，新兴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基于发展资本主义，基于迫切要求自然科学和先进技术的愿望，在自己的哲学中也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和工业生产的新经验。反对提倡迷信、盲从的经院哲学，要求尊重理性。因此，在他们的唯心主义体系中，也“愈来愈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并企图用“神即自然，自然即神”的泛神论的观点，来调和精神和物质、宗教和科学的对立。

黑格尔的哲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黑格尔是一个具有极丰富的科学知识的学者。他在当时自然科学和工业发展的推动下，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思辨唯心的辩证法体系。在这个非常唯心主义的体系中容纳了大量的人类历史和自然科学的现实内容。但是，他把这些内容硬纳入“绝对观念”的辩证发展中，于是，一切都被融化在

“绝对观念”中，一切事物都是“绝对观念”的体现。这在实质上也是用泛神论来揭示事物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而不自觉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辩证法。不过，黑格尔的泛神论是唯心主义的，他是用唯心主义泛神论的歪曲形式，反映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所以恩格斯说：“黑格尔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

（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和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8—21段）

恩格斯在确立了评价哲学路线的标准之后，就来评述费尔巴哈的哲学路线，并且分析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

1. 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第8—11段）

由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尖锐的形式”提出来，成了任何哲学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所以，施达克在对费尔巴哈的评述中，也不得不首先研究费尔巴哈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的立场。但是，由于他没有正确理解这个问题，尤其没有理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真正含义，所以，在评述中堆砌了很多不必要的哲学用语，特别是把不同派别的用语混在一起，结果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不仅贬低了黑格尔，而且歪曲了费尔巴哈，把费尔巴哈说成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恩格斯说：“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用费尔巴哈自己的话说：“我的第一个思想是上帝，第

二个是理性，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人”。^① 费尔巴哈最初在大学神学系读书，信仰上帝，后来接受黑格尔哲学（脱离人而独立存在的神秘的理性，即“绝对观念”），成为青年黑格尔派；最后又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转向唯物主义（从人出发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并尖锐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1839年他写的《黑格尔哲学批判》，标志着他走上了唯物主义道路。1841年他的具有解放作用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从此他自己也以一個杰出的唯物主义者蜚声于世。

费尔巴哈的哲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人的学说，一部分是关于自然的学说。关于自然的学说，他继承了十七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以来的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主张把自然界当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体来对待。他特别赞赏自然界是它自身的原因的观点。在认识论上，他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对费尔巴哈的这一思想理论，恩格斯作出了科学的概括：第一，费尔巴哈揭露了黑格尔哲学的神学性质。指出，黑格尔的先于世界而存在的“绝对观念”，不过是宗教上帝的残余，“绝对观念”外化为自然，就是用理性的说法来表达自然是上帝创造的宗教创世说，黑格尔哲学就是理性化的神学。第二，费尔巴哈把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同批判宗教结合起来。他指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出于一个自然的实体，超自然的东西只存在于幻想之中。我们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第三，费尔巴哈在批判灵魂不死的宗教观念中，唯物地解释了意识现象。在他看来，意识和思维是人脑的产物，认为不思想的人当然不是人，只有人的存在才有思想。人脑是思维的器官，人死后，脑就不起作用，人的精神、灵魂也就消灭了。总之，“物质不是精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47页。

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显然，费尔巴哈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上，是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这就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的基本点。但是，他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了。他因不同意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和尤其反对庸俗唯物主义而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反对用机械运动来解释一切，把人看成是机器，他认为，人是生活在“你”和“我”的有血有肉的关系中。他也不同意象霍布斯那样，把自然、物质仅仅看作是抽象的几何学上的量；也不同意斯宾诺莎那样把自然界看作在时间以外的不动的实体。他认为，自然界是多种多样的，是可以被感知、理解的实体。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德国荷兰一些自然科学家和医生那里，唯物主义以肤浅的、庸俗的形式出现，形成了一种庸俗唯物主义的思潮。他们虽然承认物质是唯一的实在，但却庸俗地解释思想，把思想也看成一种物质。如福格特（1819—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说：“思想对大脑的关系，差不多同胆汁对肝脏的关系一样”。摩莱肖特（1822—1893，荷兰哲学家、生理学家）说：“福格特的比拟，是无可争辩的。……脑筋为思想之形成所必须，正如肝为胆汁所必须，膀胱为尿之分泌所必须。”费尔巴哈认为，这种观点不是把唯物主义当作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而是看作“大厦的本身”，是十分错误的。他认为，理性、意志、感情（心）是人类的本质。唯物主义把这看作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是人脑的产物，是无可非议的。他又认为，人类的知识是自然界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自然界是人的唯一的认识对象，是取得一切知识的前提。因此，各门具体科学知识必须以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为它的理论基础，这自然也是正确的。但却不能把这个理论基础看作是各门具体科学

知识和人类本质本身。所以他说：“在我看来，唯物主义是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却“不是大厦的本身”。因此，他说“向后退时”，即用唯物主义解释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的自然根源时，他赞同唯物主义；“但是向前进时”，即象庸俗唯物主义那样，把唯物主义这一知识的理论基础看作是 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自身，他就与唯物主义不一致了。可见，费尔巴哈反对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和十九世纪庸俗唯物主义的错误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他“由于某个唯物主义学派的错误而背弃了一般唯物主义”，^①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这就放弃了唯物主义阵地和哲学的党派性原则，因而是错误的。

费尔巴哈不反对事情的本质而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词的偏见，是因为他把唯物主义的一般世界观的原则同这种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犯了用个别代替一般的方法论错误。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在哲学史上，唯物主义的第一种形式，是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这种形式的唯物主义是同自然科学还从属于哲学，没有自己的精确的研究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当时，自然界、人类历史和人们的精神活动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一切都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之中。这时，人们虽然正确地把握了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能说明它的细节，因而还看不清总画面。与此相应的是原始的、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第二种形式。它是同自然科学处于搜集材料和初步整理材料阶段相联系的，自然界被描绘为一成不变的事物

^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239页。

的集合体，是一幅机械力学的图景。这样，探索自然界所必要的孤立、分割方法被片面地夸大成为绝对的方法。于是，事物本来的相互联系随之被摒弃和割裂。与此相应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自从马克思主义把唯物主义世界观贯彻到历史领域，把自觉的辩证法转变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也就是“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由此可见，唯物主义形式的改变，实际上是基于对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深刻认识和描绘而来的思维方式的改变，它是在承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的范围内的形式改变。唯物主义形式改变的一个动因，就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根本性的突破。唯物主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各种不同的特殊形式，都是由人们所处时代的科学的发展水平（以及不同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二十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异乎寻常的发展，正如列宁所预示的那样，辩证唯物主义已走向完善和发展自己形式的新进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点的基础上，总结和概括现代科学的新成就，完善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形式，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2. 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第12—15段）

（1）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局限性。

唯物主义的发展是同自然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恩格斯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进一步论述了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的局限性。

第一，机械性。用纯粹的机械原因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是十八世纪唯物主义机械性的主要表现。比如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利模仿笛卡尔

的动物是机器写了《人是机器》一书。他把人看作是一种复杂的机器，认为人和动物不同之处，不过是人这种机器“多几个齿轮”，“多几条弹簧”。造成这种局限性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在自然科学中，达到比较完善地步的只有机械力学，而化学和生物学等还很幼稚。他们不了解化学、生物等高级运动形式虽然包括机械运动，但不能归结为机械运动；机械运动规律虽然也在化学和生物运动中起作用，但它的这种作用已经降到了次要地位。所以机械性是当时难免的一个局限性。

第二，形而上学性。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当时，他们虽然承认自然界处于永恒的运动中，但是由于他们把运动只看成是机械运动，习惯于对既成事物作孤立、静止的研究，所以，反映在哲学上就形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认为自然界是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的，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或场所的变更，一种事物只能反复地产生同样的事物，而不能转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这种想法在当时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天文学方面，牛顿的永恒的天体说占据统治地位，康德的太阳系产生于原始星云的假说刚刚提出，还几乎被人们当作奇谈。地质学还没建立起来，因而人们还不知道地球的发展史。生物学也只处在分类阶段，林耐的有机物种不变论被当作绝对真理，生物是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思想，还根本不可能提出来。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对自然的非历史观点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相适应的，而当培根和洛克把它从自然科学移到哲学上来以后，便成了影响几个世纪的思维方式。

对于这种非历史观点，恩格斯认为，大可不必责备，因为连十九世纪的黑格尔，对自然同样持有这种观点，黑格尔认为，自

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潜藏在自然界背后的“绝对观念”才是发展的，而作为“绝对观念”的外壳的自然界，是不能发展的。在自然界中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只能重复出现旧的东西，不能产生新的东西。自然界只是在空间展现出自己的多样性，在时间上是不发展的。黑格尔是一位伟大的辩证法家，而且他生活的年代，揭示物质世界内部联系和发展变化的学说已经开始建立起来，但是他却没有揭示自然的辩证法，相反，对自然持有非历史观点，这是他的唯心主义体系造成的，“方法为了要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

第三，唯心史观。恩格斯说：“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统治的斗争中，对中世纪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他们把中世纪看成是人类历史的中断，是处于“普遍野蛮状态”的黑暗时期，对历史的进步没有任何意义。这种片面地看待历史的形而上学观点，使他们没有看到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恩格斯认为，从历史的观点看，中世纪是有巨大的进步的。例如，由于斯拉夫民族侵入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日耳曼人征服西罗马帝国，使欧洲的文化领域从地中海扩大到整个欧洲，形成了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和波兰等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在十四到十五世纪又有自动纺车的出现，采矿冶金技术的改进和军事武器（枪炮）的发现等巨大的技术进步。所有这些都是近代欧洲文明史发展的必要准备，看不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这些合理因素及其继承性，对伟大历史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唯物主义原则也就不能贯彻到人类历史领域中。这样一来，历史只能被看成没有内在联系的、杂乱无章的、无数偶然事例的堆积，完全否认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历史观显然是唯心的。

(2)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庸俗唯物主义的倒退。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自然科学已经有了一系列划时代的新发现，为唯物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可是庸俗唯物主义只是用这些条件简单地重复关于上帝不存在的论据，他们不仅没有克服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而且把唯物主义庸俗化了。在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那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的，而庸俗唯物主义却把精神和物质等同起来，这就混淆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所以，是个大倒退。

唯心主义者对唯物主义的这种倒退，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时自然科学比较发展，唯心主义已经陷于“智穷才竭”，并且在1848年革命中又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庸俗唯物主义的出现，却使唯心主义者得到了一种幸灾乐祸的满足，认为唯物主义在这个时候更是江河日下了。所以恩格斯讽刺地称呼他们是“巡回传教士”和“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小贩们”，认为费尔巴哈拒绝与他们为伍，拒绝为这种唯物主义承担责任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他不该把一般唯物主义的原则与庸俗唯物主义这一特殊形态混为一谈。

3. 费尔巴哈没有克服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局限性的原因（第16—21段）

尽管费尔巴哈反对庸俗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庸俗化，可是他也没有克服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缺点，没有把唯物主义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这主要是受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限制。费尔巴哈在世时，自然科学还处于剧烈酝酿过程中，只是在费尔巴哈逝世以后的十五年，自然科学才逐步地发展到足以澄清问题的、相对完善的地步，才从它所提供的材料中，作出明确的、条理化的结论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参考书目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0—85页。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9—403页。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446页。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0—582页。

思考题

1.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是怎样论述哲学基本问题的？它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2. 怎样理解恩格斯关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原理？学习这一原理的意义是什么？
3.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是什么？
4. 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局限性的分析批判及其意义。
5. 恩格斯在这一章中是怎样论述自然科学的进步对哲学发展的意义的？

三

这一章是上章的继续。在第二章中恩格斯从整体上指出费尔巴哈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但是，由于费尔巴哈所处的历史条件以及他本人的原因，却没有克服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局限性。

在这一章中，恩格斯集中揭露了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表现——宗教哲学和伦理哲学及其实质，分析批判了费尔巴哈没有能够把唯物主义路线贯彻到底，在社会历史观上陷入唯心主义的根源。

本章有二十六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问题。

（一）揭露和批判费尔巴哈唯心主义的宗教哲学

（第1—10段）

1. 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观点（第1—3段）

施达克找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找错了地方。恩格斯在本章一开头指出：“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费尔巴哈决不希望废除宗教，他是希望使宗教完善化。”费尔巴哈是一个杰出的唯物主义者和反对宗教的无神论者。他一生写了许多著作，从各方面论证了并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按照自然界的或自己本身的面貌创造了上帝。因而，他在反宗教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费尔巴哈为什么对宗教特别感兴趣？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宗教“是人生的基础，是道德和政治的基础。”^①而他之所以批判旧宗教，又是因为，反对宗教的斗争，也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最重要的精神堡垒的斗争；同时，也是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因为，唯心主义就是理性的或理性化了的有神论，所以，谁否定唯心主义，谁就不能不同时否定上帝。但是，费尔巴哈是从人本学的角度反对宗教的，他并不了解宗教的本质，宗教的社会阶级根源。因此，他虽然反对基督教，但并不主张完全废除宗教。列宁说：“他反对宗教不是为了消灭宗教而是为了革新宗教，为了创造出一种新的、

^①《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524页。

‘高尚的’宗教”。^① 费尔巴哈认为有两种宗教：一种是旧的有神宗教，这种宗教所设想的天堂、上帝，是虚幻的、不存在的，是应该废除的；一种是新的无神宗教，这种宗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这种感情联系是人生来就有的，是不能消灭的。所以，费尔巴哈主张废除旧宗教，建立新宗教，使宗教完善化。这种宗教和以人为对象的人本学是一致的，他的哲学的任务就是研究人和人的宗教感情，所以，“哲学本身应当溶化在宗教中。”

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观点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宗教变迁史。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是从人之中抽象出来而置于人之外的人的本质，是对人的本质的虚幻的反映。神史即宗教史，就是人的历史；而人的历史，就是人的本质的历史。于是，由人的本质对象化了的宗教，就成了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发展中的决定力量。这样他就过分夸大了宗教这种意识形态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认为某一历史运动能否发展，决定于宗教观点是否深入人心。人类历史时期的划分，不是以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化为标准，而是以宗教的变迁为标准。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宗教的变迁史。

第二，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费尔巴哈认为：“心不是宗教的形式，因而宗教也不应当存在于心中；心是宗教的本质。”由于费尔巴哈把宗教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看成是一回事，因而宗教不是从外面灌输到人心中来的，是人的心灵生来就有的。心就是宗教，宗教就是心。心产生感情，这种感情关系就是宗教的形式，特别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更是他的新宗教借以实现的最高形式之一。所以，心不是宗教的形式，心是宗教的本质。由于心本身就是宗教，就不存在宗教应当不应当在心中的问题，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375页。

因为应当不应当在心中是以本来不在心中为前提的。所以说“宗教也不应当存在于心中。”

2. 对费尔巴哈唯心主义宗教哲学观点的批判（第4—7段）

第一，批判费尔巴哈把宗教看做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的错误观点。

首先，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和宗教根本是两回事，费尔巴哈把两者混为一谈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完全错误的。恩格斯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一种与人类共存亡的社会现象。宗教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它不是与人类社会共存亡的社会现象，而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它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并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高度发展以及阶级的彻底消灭而最终被消灭。恩格斯用历史事实说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和宗教并不是一回事。“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最近八百年”，指十一世纪到十九世纪。西欧在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间出现了一种反映骑士生活和理想的爱情的骑士文学，把性爱的地位看得高于一切，这种文学对以后欧洲的诗歌和小说都有很大的影响。从骑士文学开始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到十九世纪这八百年间，爱情成了一切诗歌歌颂的主题。这反映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兴起，要求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博爱，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禁欲主义的斗争。但是，这一期间，宗教的地位却是每况愈下。现存的绝大多数宗教都主张禁欲戒色、鄙视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

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对国家规定的、调节男女性爱关系的婚姻法作神学上的论证，给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祝福。这种宗教必然会随社会制度的改变而终久被消灭，“但是爱情和友谊的实践并不会发生丝毫变化。”这说明，性爱和宗教并不是不可分的。再如，法国大革命后，在1793—1798年雅各宾专政时期，基督教受到了很大的摧毁，封闭了教堂、修道院，取消了基督教僧侣的俸金和特权，许多神职人员纷纷放弃教职，教会势力在城市和部分农村几乎全被消灭。在这一时期，并没有人感到有建立新宗教的需要。到1799年，拿破仑夺取政权后，他极力恢复宗教，由于人民的抵抗，拿破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教会恢复起来。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了，宗教决不是人的感情上所必需的。因此，说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并且是荒谬的。

其次，费尔巴哈宗教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就在于是否直截了当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去看待事物。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不是直截了当地按照本来面貌看待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即性爱、友谊、同情、舍己精神等等，而是把这些关系和某种特殊的、在他看来也属于过去的宗教联系起来，断定这些关系只有在人们用宗教一词使之高度神圣化以后才会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这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本来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中建立起来的，是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是阶级关系的反映，而费尔巴哈却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同宗教联系起来，认为只有把这种关系提高到宗教的地位，建立人与人之间互爱的新宗教，才是完满的。这就不仅抹煞了宗教的社会阶级根源，而且也歪曲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否定了人们的

思想感情与经济关系的联系；这也必然要把宗教说成是与人类共存亡的永恒现象，否定宗教是一定历史范畴的现象，从而陷入了唯心史观。

费尔巴哈为了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说成是宗教，论证他建立的所谓新宗教的合理性，还从语源学上找根据。从语源学上看，“宗教”（religare）这个名词是从“联系”（religare）这个动词演变过来的。因此，费尔巴哈认为人与人之间任何联系都是宗教。恩格斯指出：“这种语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语源学是研究词语的意义及其变化的科学，它对进一步掌握语言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一个词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它们的含义往往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甚至会和他原来的含义完全相反。所以，决不能用原始的含义来代替已经变化了的现在的理解。如果我们硬要用原来的含义来解释现在对这一词的理解，这不仅在认识上会犯错误，而且在方法上也是唯心主义的。费尔巴哈不是从历史发展中来看宗教和宗教这个词的发展变化，而是牵强附会地硬把感情、性爱这种关系推崇为宗教。这正象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路易·勃朗派改良主义者一样，把宗教看成是一种永恒的现象。路易·勃朗认为，每个人天生就有宗教的信仰，不信教的人是一种怪物。他甚至认为，无神论也是一种宗教，因为无神论就是他的信仰。在这一点上费尔巴哈同路易·勃朗有异曲同工之处。

费尔巴哈企图在唯物主义自然观基础上，建立起没有上帝的真正的宗教。恩格斯指出：“这等于把现代化学当做真正的炼金术。如果无神的宗教可以存在，那末没有哲人之石的炼金术也是可以存在的了。”唯物主义按其本质来说，是无神论。无神论和宗教是根本对立的，费尔巴哈想建立以性爱为内容的“无神”的

宗教，这就等于放弃现代化学去恢复神秘的炼金术。我们知道，炼金术是在欧洲封建社会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炼金术士们企图从铁、铅等金属中炼出贵重的黄金来，用什么“点石成金”的“哲人之石”来骗人。以后天主教也利用这种炼金术来愚弄人们，使人们相信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现代化学同炼金术这种迷信活动是根本对立的，费尔巴哈想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建立“无神”的宗教，也是荒谬的，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批判费尔巴哈把人类的历史看做是宗教变迁史的错误观点。

首先，费尔巴哈把人类的历史看做是宗教的变迁史，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恩格斯指出，并不是所有历史的转变，都一定伴随着宗教的变迁。世界上只有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个世界性的宗教，才在人类历史上起过较大的作用，至于其它宗教，对历史发展并没有多大影响。例如，原始社会自发产生的部落宗教和氏族宗教，只在本氏族、本部落内起作用，一旦离开了这个氏族，它就根本不起作用了。而且它的命运也只和这个氏族、部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旦这个氏族或部落灭亡，它也就随着消失了。如日耳曼人原来信仰原始的多神教，当他们在公元476年征服西罗马帝国以后，就抛弃了原来信仰的多神教。这是因为，西罗马帝国是处在奴隶制解体向封建制转变阶段，而日耳曼人却还处在原始公社解体时期，它比西罗马帝国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这就使得原来适应于原始公社的部落神，无法适应于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状态。所以，日耳曼人就改信了罗马的基督教。历史证明，不是宗教变迁决定历史发展，而是历史的发展决定宗教的变迁。

其次，世界性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虽

然在世界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但这种作用也只是影响作用，而不是决定的作用。例如，基督教在13—17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曾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战斗旗帜。但是，恩格斯指出：“这种色彩不能象费尔巴哈所想的那样，用人的心灵和人的宗教需要来解释，而要用整个中世纪的历史来解释，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在欧洲的封建社会中，宗教神学占据统治地位，宗教神学强烈地影响着群众的思想感情。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如果不带上宗教的色彩，便无法进行革命。但是，到了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已经强大起来，能够提出与它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了。资产阶级便抛弃了宗教的外衣，直接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口号，作为动员和组织革命力量、进行推翻封建统治的战斗旗帜。这时，谁想再利用宗教的外衣也不可能了。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领袖罗伯斯庇尔在摧毁基督教后，曾想建立一个无神论的崇拜理性的新宗教，结果完全失败了。以上这些事实再一次证明，不是宗教的变迁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宗教的变迁。

3. 费尔巴哈唯心主义宗教哲学观点的危害性（第9—10段）

恩格斯分析揭露了费尔巴哈唯心主义宗教观的根源，这就是超阶级的观点和抽象的方法。恩格斯指出，在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里，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阶级的关系，根本没有“纯粹人类感情”。人们互相交往时表现出来的纯粹的感情关系，由于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的存在，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费尔巴哈极力鼓吹纯粹的人类感情，并把这种感情抬高到宗教的地位来崇拜，实际上就是否认人们之间的阶级对立，粉

饰现实，使理解阶级社会的历史成为不可能。这同在德国早已流行的历史编纂学的方法是一样的。当时一些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在编写历史时，不是把历史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而是在纯粹观念领域中兜圈子，极力抹煞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费尔巴哈深受这种观点的影响，把阶级斗争的“历史变为教会史的单纯附属品”，抹煞阶级斗争，麻痹劳动人民。恩格斯指出，现在我们已经远远超过费尔巴哈了。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从阶级产生以后，“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①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只有用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才能正确理解人类感情、人类历史。所以，“现在连他（指费尔巴哈一引者）那赞美新的爱的宗教的‘最美丽的篇章’都不堪卒读了。”

费尔巴哈之所以离开了阶级对立的现实，又是因为他用形而上学的抽象方法，把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人，抽象化为脱离现实的绝对，成为一个抽象的形象。

费尔巴哈一生反对宗教神学，批判基督教，但到最后又背叛了自己反神学、反宗教的立场，要建立一个新的爱的宗教，这是他从人本学的立场出发不可避免的结局。他把基督教的神从天上拉到地下，指出这种神是人的虚幻的反映、人的映象。但是，这个神是经过长期的抽象过程的产物，是以前的许多部落神和民族神集中起来的精华。实际上这个神并不存在，归根到底是人的映象。与此相适应，这个神所反映的人，也不是现实的、具体的人，而是抽象的人。这个抽象的人离开了一定社会、一定经济关系，就变成一个纯粹自然的人。恩格斯说：“费尔巴哈在每一页上都宣传感性，宣传专心研究具体的东西，研究现实，可是这同一个费尔巴哈，一谈到某种比人们之间的纯粹性关系更进一步的关系，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

就变成完全抽象的了。”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第52页）费尔巴哈以纯粹自然的人作为其宗教哲学的基础，这就使他必然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沼。

（二）揭露费尔巴哈伦理学的唯心主义观点（第11—25段）

费尔巴哈不仅从“人”出发来说明他的宗教哲学，而且还从“人”出发建立他的伦理学。恩格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伦理学。

1. 费尔巴哈的伦理学是贫乏的和肤浅的（第11—19段）

恩格斯把费尔巴哈的伦理学同黑格尔的伦理学加以比较，看出费尔巴哈伦理学的内容显得“惊人的贫乏又使我们诧异。”因为，费尔巴哈的伦理学形式上是现实的，内容却是抽象的，黑格尔的伦理学，形式上是唯心的，而内容却是现实的。

黑格尔的伦理学就是他的法哲学，其基础是唯心主义的“绝对观念”，是讲“绝对观念”经过主观精神到达客观精神后，表现为抽象的法、道德和伦理，在伦理中黑格尔又谈到国家、市民社会和家庭三个部分。在这几部分中又谈到国家法、财产关系、婚姻、家庭财富以及子女教育等问题。黑格尔虽然以极端抽象晦涩的“绝对观念”为基础来谈论伦理学，就形式来讲是唯心的，但却研究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实际问题。费尔巴哈在他的伦理学中，尽管标榜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大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式是现实的，但这个人却不是生活在一定时代、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的具体的人。因此，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

“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在宗教哲学中他还谈两性的爱，有男人和女人的差别，而在伦理学却连这一点差别也消失了。诚然，费尔巴哈有时也谈到“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营养物，那末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食物了。”“政治应当成为我们的宗教。”等等。这些命题虽然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实际上，他并不了解这些命题的真正含义，在他那里，这些命题仅是纯粹的空话。

善和恶是伦理学中评价人们行为的一对道德范畴。在对善恶的看法上，费尔巴哈较黑格尔也是很肤浅的。这是因为，黑格尔研究了善和恶这对范畴的辩证性质；费尔巴哈则把善和恶绝对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了善的作用。

黑格尔认为。人性本善说和人性本恶说，各有其片面性，善和恶作为对立的两个方面，善是指意志的肯定方面，恶是指意志的否定方面。二者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在肯定的善中包含着恶的否定，在否定的恶中又包含着善的肯定。然而黑格尔认为，人本性是恶的比起人本性是善的，是说出了一个更加伟大得多的思想。因为性恶说，重视后天的学习和教育，不承认天生的圣人。而如果紧紧抱住“纯善”，那是无生命的、不能发展的。所以黑格尔特别强调恶的作用，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个命题包含有双重的意思：第一，恶是一种否定力量，是对传统的、习惯的、旧有的善的观念的否定。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否定方面战胜肯定方面，新东西战胜旧东西，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第二，人的食欲和权势欲是历史发展的杠杆。黑格

尔认为，历史发展不是任何个人为所欲为的任意行动，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当然，在黑格尔看来，社会历史的规律归根到底不过是“绝对观念”运动发展的规律。他认为，人的恶劣情欲——贪欲和权势欲如果体现了绝对观念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它就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恩格斯指出，黑格尔这个思想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却包含有合理的因素，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历史的发展常常是和自私自利、争权夺势等恶劣欲望联系在一起，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可以证明。例如，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对农民和殖民地的掠夺，是用血和火的文字写出来的历史。对农民和殖民地的掠夺和压迫当然是恶事，但它符合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发展的规律，在客观上加速了社会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过程。又如，资产阶级为了榨取工人更多的剩余劳动，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不得不利用科学技术和改进生产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费尔巴哈把善和恶这对范畴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善就是绝对的善，恶是绝对的恶，不了解善恶观念的辩证发展，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他从人的本性生来就是善的出发，把抽象的爱看做是克服社会上一切灾难的法宝，就没有想到恶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费尔巴哈对善恶观念的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同黑格尔对恶的历史作用的想法相比，无疑是肤浅得多。尽管他对于人的社会性也有某些正确的说法，如人不是什么“纯粹的自然物”，“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等。但这些说法在他的哲学中不占主要位置，仍然只是一些空泛的议论。

2. 对费尔巴哈的道德基础和基本准则的批判（第20—24段）

费尔巴哈认为，追求幸福的愿望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是人人都应享有的平等权利，所以追求幸福的欲望应当是人类道德的基础。但是，人们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没有限制的，它受到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限制，即受到双重的矫正：第一，受到我们行为的自然后果的限制。例如，享受美食佳酿这是一种幸福，但它受自然的、生理的限制。酒醉之后，必定头痛，放荡成性，必生疾病。第二，受到我们行为的社会后果的限制。我们自己追求幸福，同时也必须尊重别人追求幸福，如果不尊重别人对幸福的追求，就会受到别人的反抗，反过来会妨碍自己追求幸福。为了大家的共同幸福，必须遵循一个共同的道德准则：“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永远是爱！），这就是费尔巴哈的道德的基本准则，其余的一切都是从这个准则推出来的。”

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道德基础和基本准则进行了深刻地批判：

第一，费尔巴哈的道德基础，在理论上是不符合实际的，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我们知道，追求幸福的欲望，需要和外部世界来往、和外部世界发生关系，需要有满足这些欲望的手段，需要有食物、异性、书籍、谈话、辩论、活动、消费品和操作对象。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就不可能把追求幸福的欲望变成现实。恩格斯说：二者必居其一，要末就是假定每一个人都拥有追求幸福的这些必要手段；要末就是毫无意义的一句空话。可是，在剥削制度下，广大劳动人民根本没有满足欲望的物质手段，也就谈不上什么合理的自我节制。所以，所谓追求幸福的道德原则，仍

是一句分文不值的空话。关于这一点，费尔巴哈自己也是有所觉察的。他曾说过：“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营养物，那末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食物了。”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费尔巴哈伦理学的唯心主义本质。而且还必须指出，“欲望”也决不单纯是自然的产物，同时更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因此，费尔巴哈的“欲望”也是唯心的。

关于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地主，都有严格的等级界限，根本谈不上一切人的平等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在等级上的不平等被取消了，表面上平等的权利得到了承认，宣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这个法律是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的。所以，实际上，在资本家掌握着生产资料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仅仅有最必要的维持生活的手段，这并不比奴隶和农民好多少。这是物质生活方面。至于谈到精神生活方面追求幸福的手段，如教育、科学、文化艺术等都被资产阶级所垄断。因此，鼓吹这种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就象德国资产阶级鼓吹“萨多瓦小学教师”，说普鲁士是由于教育制度的优越性，才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战胜奥国一样，仅仅是一个神话而已。

第二，费尔巴哈道德的基本准则，是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恩格斯指出，按照费尔巴哈的道德准则，资本主义的证券交易所就变成了最高的道德殿堂。因为去证券交易所进行投机的每一个人。为了追求幸福，都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都希望自己发财致富。在这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平等

的。如果一个资本家投机发了财，证明他正确估计了自己行为的后果，并没有妨碍别人去追求幸福，因而是最有道德的。至于那些在投机中的失败者，也不能埋怨别人，因为他没有正确地估计自己行为的后果，这就证明他的行为是不合乎道德的。这时，投机的取胜者，完全可以摆出象希腊神话中地狱里的审判官拉达曼一样的架势，宣判我是合乎道德的，应该受到奖赏，而投机的失败者是违反道德的，应该受到惩罚。这时，费尔巴哈的“爱”这个温情的字眼，已经不是互相爱了，而是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这就是“爱”应当完成和实际上从事的事情。所以，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的道德是完全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管他自己多么不愿意或想不到是这样。”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根本对立的社会里，费尔巴哈认为爱是万能的，它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是能够解决实际生活中一切苦难、一切问题的万能良药。“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费尔巴哈用这种超阶级的爱来调和阶级矛盾，实质上起着掩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麻痹无产阶级斗志的作用。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正是利用这种超阶级的爱，来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服务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对此进行了深刻地批判，指出：这是镇压工人阶级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3. 恩格斯论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第25段）

恩格斯针对费尔巴哈伦理学上的错误观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的一些基本观点：

第一，道德的历史性。一切道德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道德，没有什么超历史、抽象的永恒的道德原则。因为道德是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经济基础不同，道德也就不同，经济基础变化了，道德迟早也要随之发生变化。费尔巴哈企图创立一种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的永恒道德原则，那就象康德的先天的“绝对命令”的道德原则一样软弱无力，“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

第二、道德的阶级性。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道德观时指出：“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①在本书中，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在阶级社会中，不仅有奴隶主道德，封建主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而且还有和它们对立的奴隶道德，农民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道德既是一定阶级的道德，同时又具有职业（即行业）道德的特征。在社会中，由于分工的不同，不仅在经济领域中有各种不同行业，就是在上层建筑领域也有不同职业分工，如职业政治家、职业军事家等等，这就形成了各行各业的道德，即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和一定阶级的道德紧密联系的，有封建社会的职业道德，资本主义社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职业道德。职业道德当然有它本身的特点，但

^①《反杜林论》，第91页。

它始终是在阶级道德的制约和影响下存在和发展的，都不能脱离阶级道德而单独存在。

每一个阶级都按照自己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但是，剥削阶级的成员，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并不都会恪守自己确立的道德原则。封建地主阶级满口讲的“仁义道德”，实际做的却是寡廉鲜耻。资产阶级的本性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根本谈不上对其他人的爱，他们爱的只是自己。费尔巴哈鼓吹的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愛，实际上表现在战争、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大限度的剥削之中，这对费尔巴哈道德的基本准则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三）费尔巴哈陷入唯心史观的 根源（第26—27段）

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所提供的强大推动力怎么能对他本人也毫无结果呢？”我们知道，费尔巴哈用唯物主义炸开了黑格尔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解除了黑格尔思辨思维的魔法，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宝座，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的世界观有很大的影响。可是，为什么他不能用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宗教和伦理等社会现象？为什么在历史观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①具体地说：

1. 从认识根源上，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费尔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页。

巴哈的哲学是把人和现实世界作为出发点的，但是他的这个“人”不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而是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的人。在他那里现实世界只是认识的对象，而不是改造的对象。他不了解人类的社会实践，特别是革命斗争的实践对认识的深刻意义，因而找不到从抽象王国通向现实世界的道路。要找到通向现实世界的道路，就必须“把这些人当做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也就是把人当做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的人。但是，费尔巴哈不仅不理解社会实践的重要性，而且还反对从社会实践角度去研究人，反对把现实世界看做实践的对象。因而，也就不能真正的了解人和现实世界的本质，也就根本不可能正确认识 and 说明社会现象。所以，恩格斯说：“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

2，从社会历史根源上说，费尔巴哈不仅不了解社会实践的重要性，而且还反对从社会实践中去研究人，因而就不了解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意义。同时，他还受德国反动当局的迫害，长期隐居乡下，脱离社会实践，脱离政治，当然谈不上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总结斗争经验，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这样，唯物主义的费尔巴哈，从同一个自然界和人出发，一旦接触到人类社会及其历史，便立即陷入了唯心史观。

“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找到了从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的道路，这就是革命实践道路。他们亲身参加了反对德国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总结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经验，吸取前人的思想成果，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即唯物史观代替了费尔

巴哈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创立了科学的历史观。“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于1845年2月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他们批判了思辨的唯心主义，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布鲁诺·鲍威尔一伙的唯心史观，论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提出了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的原理，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资本主义，自己解放自己，从而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 考 书 目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42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90—92页。

列宁：《哲学笔记》，《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53—79页。

思 考 题

1. 恩格斯是怎样批判费尔巴哈宗教哲学的唯心主义观点的？
2. 费尔巴哈伦理学的根本错误是什么？驳合理利己主义的谬论。
3. 如何理解道德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的原理？试运用这一原理说明加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4. 费尔巴哈陷入唯心史观的根源和教训是什么？

四

本章是前三章的概括，是全书的核心部分。前三章说明到费尔巴哈为止，德国古典哲学达到了顶点，被挤到后台去）。本章恩格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伟大意义和它的基本原理。

本章有二十六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 和自然科学基础（第1—8段）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人类认识史上发生了一次伟大的革命变革：一个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厚的理论来源和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1.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第1—5段）

（1）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创立了彻底的唯物主义。

在青年黑格尔派中，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的哲学活动，只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从基督教的发展史对基督教作了一些片面的说明，而没有通过对基督教的批判走上唯物主义的道路。费尔巴哈是青年黑格尔派中一位杰出的哲学家。他首先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决裂，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是，他仍然没

上
下
左
右
前
后
内
外
中
心
主
义

有逾越旧哲学的“屏障”，企图建立“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的绝对真理的哲学体系；他没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领域中去，是个半截子唯物主义者；他不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能批判地克服黑格尔，只是简单地把它抛在一边；他的历史观不仅是唯心主义的，而且是非常抽象的，“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来和黑格尔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抗衡。”费尔巴哈哲学的弊病，决定了他不可能克服十八世纪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完成创立新哲学的任务。

与费尔巴哈和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的道路。这是通过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继承了费尔巴哈唯物论的“基本内核”，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认真地在理论上发展唯物主义，完成创建新哲学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实现的。这种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决意按照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的本来面貌来认识现实世界，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事实。因此，这种新哲学不仅与一切唯心主义哲学根本不同，而且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根本不同，它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为此，它不仅唯物地辩证地从事物本身的联系去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清除了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的性质，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而且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它运用到一切领域中去，特别是运用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研究，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思想发展史作出的最重大贡献。

(2) 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创立了唯物辩证法。

返回到唯物主义，必然导致与黑格尔哲学的分离。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黑格尔的态度与费尔巴哈截然不同，“黑格尔不是简单地被放在一边”，而是对他的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地改造，拯救其唯心主义哲学中隐藏着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这正是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来源和出发点。但是，这个方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中是无用的。因为“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概念不仅是从来就有的，与能思维的人脑无关，而且是全部现存世界的真正的活的灵魂。在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发展，只是概念的自己的运动的翻版。这样，辩证法就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不是客观世界的辩证法决定人类思维的主观辩证法，而是相反。这就从根本上歪曲了辩证法的本质，窒息了辩证法的生机，革命的方法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体系所闷死。只有对这种唯心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地改造，才能发挥其革命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批判的改造。这种改造的实质，就是把黑格尔所颠倒了的思想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关系，再颠倒过来，“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把概念本身看做是现实的思维着的人脑的产物。这样一来，“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是恩格斯给辩证法所下的一个经典定义。这个科学所反映（或概括）的是两个系列的规律，一个是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一个是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这两个系列的规律“本质上是同一的”。因为思维规律是自然规

律和社会规律的反映，二者相符合。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因为，思维规律可以自觉地运用，并且可以撇开一些表面的、非本质的、偶然的因素；而外部世界的规律则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并通过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表现出来。自然界的情况是这样，人类社会的情况也是这样。可见，概念的辩证法并不象黑格尔体系中所表现的那么神秘，它不过是对现实世界辩证运动的自觉认识，是客观辩证法的自觉反映。黑格尔不懂得这个道理，把概念的辩证法看成是客观世界辩证法的基础，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二者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把被黑格尔颠倒了辩证法再倒转过来，使它“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于是，在黑格尔那里无用的辩证法，便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显然，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用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的例子，说明唯物辩证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②。狄慈根通过自己的道路发现唯物辩证法这件事说明，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思维的时代到来了。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哲学中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和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并使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宣告了“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这就是说，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世界不是彼此孤立和静止不变的事物的简单堆积，而是普遍联系和不断生成、灭亡等发展变化的过程的统一体；事物及其思想映象即概念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其运动变化是绝对的；在事物的变化过程中，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本质上是受必然性支配着，所以，后退是暂时的，前进的总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事物“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既是整个客观世界的本质，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或总特征。唯物辩证法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因此，人们不应当只是口头上承认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而应当把它切实地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如果人们始终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他们就能克服形而上学的“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荒谬思想；就会意识到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大都只有相对的意义。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对于人类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基础（第6—8段）

恩格斯指出：推动哲学发展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进步，“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第19页）。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如此。它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革命实践经验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而获得的成果，而且也是生产实践和自然科学长期发展的产物，是对十九世纪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概括和总结。

（1）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敲响了形而上学的丧钟。

在唯物辩证法创立之前，形而上学的方法占统治地位。所谓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做孤立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否认客观世界的联系和发展。这种方法在当时有重大的历史根据，它是由人类认识发展的逻辑秩序和自然科学的特定状况决定的。人类认识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人们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人类认识发展的这种逻辑秩序反映在自然科学上，就是十五到十八世纪以搜集材料的科学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和研究方法。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①但是，这种自然科学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研究方法被英国的哲学家培根和洛克搬到哲学领域，使之绝对化、理论化，就造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十九世纪，自然科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主要标志就是研究植物机体和动物机体中的过程的生理学（如法国的拉马克

^①《反杜林论》，第18页。

〈1744—1829〉的进化论），研究单个机体从胚胎到成熟发育过程的胚胎学（如俄国的拜尔〈1792—1876〉的比较胚胎学）和研究地壳逐渐形成过程的地质学（如英国的查理·莱伊尔〈1797—1875〉关于地球缓慢变化而成的理论）的相继出现。这表明，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突破了搜集材料的阶段，上升到了整理材料的阶段。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把这些自然过程综合为一个整体的联系的科学。自然科学发展的这种情况，迫切地要求哲学概括，以作为自己进一步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这种哲学概括要求能够揭示自然界的各种过程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这就敲响了形而上学的丧钟，注定了辩证法的必然产生。

（2）三大发现的哲学意义。

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相互关系的认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十九世纪中期的三大发现。它大大推动了人类认识的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提供了充分的自然科学论据。

第一是发现了细胞。细胞的发现证明，细胞是构成动植物机体的基本单位，整个动植物“都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发育起来的”，有机体改变自己的物种，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也是通过细胞的变异而实现的。这一发现的哲学意义在于：证明一切生物以及人的机体，不是彼此孤立、永恒不变的，它们是有着同一的结构，按照共同的规律，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

第二是能的转化。它揭示了一切在无机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力或能，都是物质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由一种转变为另一种”，“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这一发现的哲学意义就在于：证明了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离地客

观存在，一切运动都是由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化过程，物质和运动都是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

第三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从各种生物物种之间的联系以及生物与周围环境的联系中，证明了生物变异和遗传的普遍性。正是这一点，把在新的条件下发生的变异，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并积累起来，形成许多不同的品种。今天存在的一切生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经过长期发育变异而来的，这些胚胎又是由无机物通过化学途径产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演化而来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哲学意义在于：证明了不仅有机界是互相联系的整体，而且无机界和有机界也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并且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转化过程。马克思曾经指出：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①

总之，三大发现从不同的侧面和层次揭示了世界的物质性和客观性；自然界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和各个领域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物质与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和统一性。这就以科学的真理沉重地打破了宗教迷信的神创论，打击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和科学证明。

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新的自然观的产生，必然导致自然哲学的完结。自然哲学是一种关于自然界的哲学学说。在十七——十九世纪初叶，它担当着描绘自然界的总的图画的任务。那时，自然科学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还不能科学地解释自然界的许多现象及其内在联系。于是，哲学家们便“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81页。

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他们这样建立起来的关于自然界的理论体系，虽然提出过一些天才的猜测，但终究缺乏科学的根据；并且有些猜测甚至是极其荒唐可笑的。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在十九世纪，当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充分揭示了自然界的辩证性质，使我们“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时，自然哲学则因不再需要而被清除了；辩证唯物主义已成了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任何复活自然哲学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

（二）唯物史观的创立及其基本原理

（ 9—25段 ）

恩格斯在第二章中评述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时就说过：“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第21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任务。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不仅引起了自然观的革命变革，宣告了旧的自然哲学的破产，而且尤其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产生了最重要的、真实的结果，宣告了一切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终结。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恩格斯在本章中通过对唯物史观方法论原则的论述，在揭示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的前提下，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全面地考察、分析了人类社会历史最一般的客观规律，勾划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体系。

1. 新哲学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光荣使命（9段）

恩格斯首先指出，如同自然界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有自己的客观规律。但是，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其他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历史观上，唯心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哲学家往往用自己头脑中臆想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受人或神，主观或客观的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支配的。例如，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就把社会历史的发展，看做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绝对观念”实现的企图、愿望和坚定不移的意向，乃是“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这样，社会历史自身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就被歪曲和抹杀了。这是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一切旧哲学历史观的要害之所在。

针对唯心史观的根本弊病，基于唯物辩证法对自然界的理解，恩格斯对如何建立科学的、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对如何唯物论的、辩证的理解、认识人类社会及其历史，作了详尽的论述。恩格斯明确地指出，新哲学的光荣使命，最重要的，就是要在社会历史领域里也同在自然领域里一样，清除人为的主观臆造的联系，去发现现实的联系，“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

2. 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10段）

接着，恩格斯便论述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问题。

恩格斯指出，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确实具有显著不同的特点。自然界的发展是通过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实现的，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没有预期目的的。相反，

社会及其历史的主体却是自觉的、有意识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预期目的的。这是一个本质的差别。正是这一本质差别，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的进程。因此，充分注意、掌握这种差别；对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研究，特别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件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即使如此，“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

首先，从目的和结果的关系上来看。的确，与自然发展史不同，在社会领域里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追求某种预期的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和预期的目的的。然而，“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这就表明，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目的与结果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联系，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性。对此，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

其次，从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上来看。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每个人都是在一定的预期目的支配下进行活动。但是，这些目的在多数场合下都彼此冲突。有的期望这样，有的期望那样；有的能够实现，有的则不能实现；有的初看起来是实现了，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完全相似的状况，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受偶然性支配着。但是，偶然性与必然性是不可分割的，“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更明确地发挥了这个思想。他指出：“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①

3. 探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唯一途径（11—13段）

恩格斯以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论述了探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途径。

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发展史。人是社会发展史的主体，人在社会历史活动中抱有自觉的愿望和预期的目的。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人创造的。这是社会发展史的特点。因此，要探究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注意研究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但是决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动机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因为人的思想动机纷繁复杂，本身无规律可循。同时，思想动机对于历史发展的全部结果来说只有从属的意义，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因。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才能揭示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一切历史观之所以是唯心主义的，从方法论上讲，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忽略或者歪曲了人们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力和原因。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探究人们思想动机背后更深刻的动力和原因的问题。如果说它有什么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只是古希腊的实用主义（不是指作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之一的实用主义）历史观的翻版。这种历史观虽然反对纯客观地叙述历史事件，主张寻求历史事件的因果联系，但却认为，历史的最终原因在于人们的主观动机。旧唯物主义就是按照人们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由此，它们得出结论：研究历史是无用的。这显然是一种割断历史的错误，是唯心主义的。恩格斯说，马克思主义却由此得出结论：由于旧唯物主义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的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结果，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陷入了唯心史观。所以旧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这种不彻底的地方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

与旧唯物主义者不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家黑格尔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在这

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是它决定了人们的动机，从而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是极其深刻的见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人类历史观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但是，黑格尔不是在历史自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历史之外，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在黑格尔看来，“绝对观念”是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本质和本源。人类社会是“绝对观念”发展到一定阶段“外化”的结果，社会发展的历史是“绝对观念”逐渐实现的历史。“绝对观念”在自我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实现不同的原则，由此便造成了社会发展史的不同时代。参与社会历史活动的人物特别是那些杰出人物，不过是“绝对观念”借以实现某个原则的工具，他们的思想动机也不过是“绝对精神”的曲折体现。因此，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绝对观念”的发展决定的。显然，这种神秘的唯心主义观点，根本不可能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旧哲学没有找到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揭示了探究历史发展动力的唯一途径。恩格斯指出：探究历史人物动机背后的动因，即构成历史发展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应当首先注意的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并且是在历史发展中“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当然，对于他们自觉动机的各种表现形式——明显的或不明显的、直接的或以思想的、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伟大人物头脑中的动因，也要加以研究。这是引导我们去探索动机背后的动因，即推动广大群众、整个民族和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客观物质原因，发现“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

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历史唯物主义在强调研究人民群众的思想动机时，并不否认研究杰出人物的思想动机的意义。但是，真正深刻地体现着历史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所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条重要的基本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重要的基本原理和根本标志。

4.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14段）

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愿望和动机，归根到底是由其所处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只有具体地考察社会各阶级思想动机的动因和结果，抓住阶级斗争的基本线索，才能使我们从“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①恩格斯正是通过这个途径，揭示出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以及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在阶级社会中的表现。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要探索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等级制度和宗法关系掩盖了阶级关系，历史事件的因果联系被弄得非常混乱，不可能看清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原因。

到了近代，在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等级制度被废除了，宗法关系被破坏了。十八世纪末出现大工业以来，特别是自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阶级矛盾的加剧，使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明朗化、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一般人都觉察到，“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推动着英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法国，从1814年4月波旁王朝复辟到1830年7月这个王朝的再度被推翻，资产阶级与封建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587页。

势力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构成了法国社会历史的基本内容。复辟时期的历史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等人，在总结当时的历史事变时，已经意识到阶级斗争“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

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在英法两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斗争的同时，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是现代历史的动力。

总之，恩格斯指出，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历史的动因和结果的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阶级利益的冲突和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①。

5. 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15段）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但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是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因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源和内容不是别的，正是基于生产方式的整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

恩格斯是用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来阐明这一基本原理的。他首先指出，阶级的起源、发展和斗争，是由于纯粹的经济原因，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的结果。西欧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所有制的产生，根源于罗马奴隶制帝国内部封建经济因素的不断增长，而日耳曼人的暴力掠夺只是起了加速的作用。同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也完全是由于社会内部的经济原因，是由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由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行会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过渡过程中而产生的两个阶级。阶级产生的根源，决定了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不论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还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虽然总是表现为争夺统治权的政治斗争，但是，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一定的经济利益，而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阶级斗争推动历史的发展，又是通过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是代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的新兴资产阶级，“起来反抗封建土地占有者和行会师傅所代表的生产秩序”，结局是“封建桎梏被打碎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愈来愈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这样，资本主义本身就陷入一种荒谬的矛盾：千百万劳动人民所以缺乏生活资料，正是由于他们生产了过多的生活资料。这个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地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显然，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趋势，也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

历史的辩证法揭示出一个真理：与阶级斗争相比，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更深刻的动力，阶级斗争则是生产方式推动社会历史发展所赖以实现的巨大杠杆，归根到底，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是隐藏在人们思想动机背后的最深刻的动因，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客观规律。

6.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16—25段）

任何社会形态都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三个基本层次构成的。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既要研究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又要考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把握整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把握这一规律在阶级社会的表现——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规律。于是，恩格斯便考察、论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

(1) 经济基础决定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国家和法的特点。

社会发展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表明，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任何政治斗争也都是阶级斗争。这就是说，一切争取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必然发展和表现为被压迫阶级反对反动统治阶级，推翻其统治的政治斗争。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没有政治上的解放就不可能有经济上的解放。同时，一切政治斗争都决不是孤立的个人之间争权夺利的活动，而总是基于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整个阶级的行动。可见，经济解放是目的，政治斗争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或即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是，传统的唯心主义国家观，却把政治权力即国家视为决定性的因素，而经济关系则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这种观点是与事情的表面现象相符合的。正象一个人的行动总是受他的头脑中的思想动机的支配一样，一个社会的经济要求只有通过国家的愿望并采取法律形式，才能取得普遍的效力。但是，这只是问题的形式和现象，而不是问题的内容和本质。如果进一步深入探究，国家愿望的内容是什么呢？它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国家所期望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呢？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会发现，国家的愿望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归根到底是由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的。从国家对社会生活条件的依赖关系看，它也“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其“存在和发展归

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这在现代的国家是这样，古代的国家更是这样了。因为古代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要用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才能勉强生活，所以，古代国家对经济的依赖性比现代国家更为直接。

法如同国家政治制度一样，也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是为保护、巩固、发展统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的。法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法律形式的表现，而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是由其经济、政治地位所决定的。所以，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既然国家和公法（国家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法（民法）也是这样，而且与保护剥削阶级整体利益的国家政治制度和公法比起来，这种关系就更加明显。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了私有者在统治阶级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和支配私有财产的权利，更直接地维护剥削阶级的经济利益。英、德、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法，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各国的私法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这种依情况的不同，“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归根到底还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英国的私法，把旧的封建法权形式的大部分保存下来，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意。这种内容与形式的不一致，却是与英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妥协，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长期并存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相一致的。法国的民法和德国的民法虽然以同一个罗马法为基础，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前者内容与形式相一致，是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法典；后者，无论是“普通法”，还是“普鲁士国家法”，其形式与内容都是相抵触。

的，即使从单纯的法学观点来看也是不好的。这种法律形式的差异性，只有从法德两国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差异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经济基础决定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世之前，人们却把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看作是脱离并且决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东西。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是有其深刻的认识论根源的。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时，“支配着生产的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而创立的一个政权机关。因此，国家一旦产生，对于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说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随着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它愈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愈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愈加独立。”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阶级反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就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国家政权被视为斗争的唯一目标和成败的根本标志，政权问题成了革命的根本问题。国家政权常常由一个阶级的手中转到另一个阶级的手中。于是国家政权，以及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与经济基础的联系，就日益模糊起来，甚至完全消失了。国家成了一种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决定支配全社会的精神力量，支配人的意识形态的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法的情形也是这样。既然国家被看作是对社会的独立力量，在职业政治家和法学家眼里，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法，也就被认为是独立的领域，它同经济基础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因为在他们看来，某种经济事实只有得到法律的认可，才是合理的和能够存在的。同时，国家立法机关在认可某种经济事实时，总是要考虑到现行的法律关系，避免自相矛盾。他们由此得出结论：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总之，片面地夸

大了国家政治制度和法的相对独立性这一特点，是在国家和法问题上陷入唯心史观的认识论根源。

(2) 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

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它们也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①经济基础决定哲学。哲学是以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为研究对象。与其他意识形式相比，其抽象程度更高，因而距离社会经济基础更远。同时，它是以高度概括的逻辑、概念的形式，通过政治、法律、道德等中间环节反映经济关系。因此，“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不管它们离得多么远，“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任何哲学，都是一定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特殊形态世界观形式的表现，为一定社会阶级的人们所创造，表现着一定社会阶级的需要，反映着社会生产发展的水平，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阶段。所以，哲学的命运，始终要看它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如何而定。

哲学与经济基础的联系，为近代哲学的发展所证明。十五至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是与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发展壮大相适应的，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十七至十八世纪英国的培根、霍布斯的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变革时期的唯物论，是资产阶级要求发展科学技术，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哲学表现。以后出现的洛克的哲学，则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的产儿。”①至于贝克莱和休谟的哲学，则是资产阶级走向保守、反动的一种哲学说教。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敢于同一切官方哲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

是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充分，资产阶级革命成熟的反映。以纯粹思辨形式出现的高度抽象的黑格尔哲学，恰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足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相一致。就我们所看到的哲学家中，有许多同时又是经济学家，如英国的休谟和法国的狄德罗等，在他们的哲学中更容易看到与经济关系的密切联系。

由此可见，哲学并不是由抽象的思维决定的，而是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反映。经济是基础，哲学则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中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是经济高涨的结果”。^①

②经济基础决定宗教。与哲学相比，宗教是离开物质生活条件最远的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它是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虚幻反映，是一种被颠倒和被歪曲了的世界观，并且又在如同哲学一样的抽象性和间接性上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幻影。所以，它往往被认为是同社会经济关系最不相干的意识形态。恩格斯详细地考察了宗教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揭示了宗教与社会经济的联系。

首先，宗教的起源和演变是由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决定的。在最原始的时代，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的思维能力非常有限，对“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都不理解，错误地认为有一个不死的灵魂和一种主宰世界的超自然的力量，于是便产生了原始的宗教观念。最初的宗教观念是以血统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集团所共有的。后来由于经济的发展，氏族集团的分裂，就产生了各自信奉的神，而这些神是随着这些氏族的存亡而存亡。奴隶制在罗马确立之后，产生了国家，取代了原来的氏族经济，并通过二百多年的武力扩张，统一了地中海地区，建立了罗马世界帝国。这时，“旧有的民族没落了，……旧有的民族的神就灭亡了”。此后，罗马帝国要求一种“世界宗教来充实世界帝国”。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

这时，奴隶在反抗奴隶主的斗争中在犹太神学基础上利用新柏拉图主义关于灵魂不死的说教，和新斯多葛主义的禁欲主义、精神忏悔、顺从命运等宿命论，创立了基督教。最初，已遭到罗马统治者的残酷迫害。以后逐渐便被统治者所利用，并于公元325年定为国教，“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它是适应时势的宗教。”在中世纪，基督教又成为欧洲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采取了一种与封建等级制相适应的封建教阶制，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在封建社会末期，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又出现了与天主教相对抗的新教异端。这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斗争形式。当现代无产阶级的前身——城市平民、零工和各种仆役壮大起来的时候，新教异端又分化为市民温和派和平民革命派。这种分化根源于市民阶级与早期无产阶级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可见，基督教的这种分裂和变化，都是由当时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决定的，都是当时的社会存在的反映。

其次，宗教的改革运动也是由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随着新兴市民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地方性的宗教异端发展成为采取民族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虽然首次爆发，却以失败告终。这归根到底是由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又不够发展，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妥协性的状况所决定的。与德国的宗教改革不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一方面是因为加尔文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因而成为荷兰、英国等地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英国、荷兰等地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为充分地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也较强大，因而能够在加尔文教旗帜下，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可见，德国与英国和荷兰社会经济状况的差别，决定了各自宗教改革运动的命运。

再次，恩格斯还论述了资产阶级革命利用不利用宗教与经济条件的关系。英国和荷兰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利用宗教作意识形态的外衣。当资产阶级力量足够强大，开始形成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时，资产阶级革命在法国，则采取了非宗教的、纯粹政治的形式。这样，基督教就“踏进了最后阶段。此后，它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外衣了，它愈来愈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做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

恩格斯最后指出，如同哲学一样，宗教也有它本身的思想继承性，“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宗教一旦产生，就同传统的材料相结合而发展，“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然而，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由此所规定的宗教思想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仍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

综上所述，国家、法、哲学和宗教等上层建筑，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这是恩格斯为了重点批驳唯心史观而阐明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这个原理，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被机会主义歪曲了。他们把经济基础说成是唯一决定的因素，否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恩格斯对这种机会主义进行了尖锐地批驳。他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

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①。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26段）

恩格斯在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之后，概括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伟大意义。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人类的认识、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的发展，为新的科学的世界观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概括自然科学的成就，批判地吸取和改造了人类认识史上，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优秀成果，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彻底发展了唯物主义，把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结合起来，创立了唯一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伟大革命变革。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使一切历史唯心主义哲学成为不必要和不可能的。“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在自然领域或社会历史领域，“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辩证的唯物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统一起来，科学地解决了哲学的对象问题，使哲学第一次真正获得了科学的性质。这样，作为“科学的科学”的旧哲学就从自然领域和历史领域中最终被驱逐出去了。这样，在旧哲学中要说还留下点什么东西的话，就只能是“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因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是其他具体科学所不能代替的，它在思维领域中还可以作为独立的研究部门保留下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思想武器。学习恩格斯在本章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于我们坚持唯物论，反对一切唯心主义怪想；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坚持历史唯物论，反对历史唯心论；牢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防止在“四化”建设中“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发生；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和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完成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有着重大的意义。



本书的最后两段是结束语。恩格斯通过对1848年革命后德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待理论不同态度的分析，精辟地论述了哲学的党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基础上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的问题。

德国1848年的革命是德国政治、经济、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1848年革命前，德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总的说来它还是处在上升时期。为了夺取政权，发展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不顾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在实践上能否实现，甚至不畏来自警方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干涉，热衷于纯粹的理论研究，为行将到来的革命作舆论准备。因此，当时德国理论界比较活跃，在哲学、自然科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出现了席勒、歌德、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他们的成就不仅丰富了人类文化知识的宝库，而且也给德国民族带来

极大的光荣。

但是，1848年革命后，“有教养的”德国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妥协，逐渐爬上了统治地位。从此，他们就“抛弃了理论”，热衷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活动。特别是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德国的大工业和国际贸易都得到了发展，资产阶级感到从前热衷于理论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们便从理论领域“转入了实践的领域”即只注意投机牟利，“思辨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里筑起自己的殿堂”。这时，在自然科学方面，特别是对某些个别事物的研究方面，德国虽然还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但在理论研究方面却远远落后于英国。总之，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德国资产阶级“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已完全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庸俗浅薄的折衷主义和唯利是图，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因为现在已经是“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代。”

“德国人的理论兴趣，现在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彻底、最革命的阶级，他的阶级利益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他“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虑，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因此，真理揭示得越彻底，就越能说明无产阶级的光明前途；“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所以，和反动的剥削阶级相反，无产阶级不惧怕真理，不怕用理论来揭示真理，对于理论的兴趣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哲学，它的革命性和科学性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给工人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的思想理论武器，“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参 考 书 目

-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0—218页。
-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4—25页。
- 恩格斯：《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9页。
-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0—487页。
- 列 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0—588页。
-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24—454页。

思 考 题

1. 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批判继承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的？
2.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3. 恩格斯为什么在《费尔巴哈论》中集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怎样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4. 恩格斯在这一章中是怎样论述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哲学的关系的？
5. 从《结束语》的学习中得到什么启示？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简释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写于1845年春。这份《提纲》原以《关于费尔巴哈》为题，写在马克思1844——1847年的笔记本上。它在马克思生前未曾发表。恩格斯在1888年出版《费尔巴哈论》单行本时，作为附录首次公诸于世，发表前，恩格斯曾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并指出了它的写作时间地点和意义。恩格斯高度评价这一笔记，认为这是一份“非常宝贵的”、“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第4页）。

马克思的《提纲》是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研究了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基督教的本质》等著作之后写的。因为，当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费尔巴哈摆脱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走上唯物主义的道路之后，随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展，根据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否定革命实践，离开人的社会关系，离开历史的发展讲人的本质，片面强调人的自然属性，离开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先进阶级来讲哲学，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因而依然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所以，不摆脱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本主义，就不可能过渡到历史唯物主义。彻底清算费尔巴哈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是同一个过程。只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影响，才能形成和确立唯物史观，反之，只有唯物史观的形成和确立，才能最终离开费尔巴

哈。于是，到1845年春天，马克思从巴黎到达布鲁塞尔研究了费尔巴哈的上述著作之后，便写了这个《提纲》。后来恩格斯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到：“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①《提纲》就是为着“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而写的笔记。

马克思把自己的这个提纲定名为《关于费尔巴哈》，恩格斯在为自己的著作写的序言中称之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都突出了费尔巴哈，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原来推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为他们提供思想武器和理论酵母的费尔巴哈，已经成为马克思思想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彻底清算费尔巴哈和确立唯物史观。为此，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超出“人本身”而转入现实的经济关系，即研究政治经济学。《提纲》展示了这一点。它以批判费尔巴哈，作为发挥马克思思想的主要方式，就表明他们最后离开了这个“中间环节”，跃进到一个崭新的思想领域——唯物主义历史观。《提纲》从根本上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把社会实践当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和第一的基本观点提了出来，并由此阐明了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强调了这一新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从而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这就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同唯心主义，而且同旧唯物主义以及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划清了界线；不仅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提出了纲领性意见，而且为制定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提供了一个纲要。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页。

判》序言》、《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著作中所阐发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思想，都已包含在《提纲》中。所以，《提纲》标志着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初步形成，也标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面制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开始。

《提纲》共十一条，大致可以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条，马克思用科学的实践观点作为考察主体和客体关系问题的基础，作为自己全部理论的基石，从而使自己的哲学从总体上同一切旧哲学根本对立起来，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所以，第一条是整个《提纲》的总纲。以下诸条是这一总纲的具体化和展开，是从几个基本方面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对立。第二部分是第二条，说明人的思维是否有能力认识真理以及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第三部分是三条至九条，说明旧唯物主义由于不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所以在社会历史领域必然陷入唯心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科学的社会实践作为自己全部思想理论的基石，从而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使唯物论、辩证法、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等成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第四部分是十、十一两条，总括地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阶级性和实践性，从阶级性和社会历史作用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一切旧哲学根本对立起来，进一步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领域里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的实质。

下面对《提纲》的十一条的主要内容，分四部分并按顺序作一简略的说明。

第一部分

实践的观点是贯穿《提纲》的根本的观点。《提纲》各条都从社会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从根本上对立起来，而《提纲》的第一条，则从总体上揭示了这一根本对立的基础和意义。这一条主要从三个方面批判了旧唯物主义不懂得、抹杀社会实践的作用和意义的错误。

（一）揭露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

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把客观的现实世界只看作是直观地认识的对象，而不是首先看作是改造的对象；把人的活动只看作是消极、被动的适应外界，而不是首先看作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事物、现实、感性”三个词，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是一回事，都是指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其中包括人。费尔巴哈曾经说过：“感性”就是“实际存在着的，因此，在我看来，它具有和现实同样的意义。”^①为什么费尔巴哈认为客观事物也包括人呢？因为在他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样，自然界和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便成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对象。他说：“观察自然，观察人吧！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哲学的秘密。”^②这样，在费尔巴哈那里，人同自然界一样，也只是一种感性客体，而人对自然只是观察、直观、依赖；客观世界也只是人的感性直观（反映）的客体，依赖的对象。就是说，费尔巴哈只从客体而不是也

^①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54页。

^②《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15页。

从实践主体的方面去理解客观事物。因此，费尔巴哈把自己的哲学叫做“感性哲学”。

这样，相对于宗教、神学、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来说，尽管费尔巴哈这些思想的基本路线是唯物主义的，但却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并且是不彻底的。他完全不懂得，客观世界不仅是作为客体存在着，而且自有人类以来，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费尔巴哈所说的感性直观对象、“依赖”对象）就不再是单纯的客体，而是打上了人类实践的印记，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并且客体之所以称为客体，也只是在与主体发生一定关系与主体相对而言的。实际上，人也不单纯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就其实质来说（就人之所以为人来说），它是作为社会的主体而存在的；人也不是本能地适应自然界，而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否则，人类就不能存在。人和自然的关系，首先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然后才有反映被反映的关系；客观世界首先是人类实践的对象，才能成为认识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依靠商业的结果才在我们这个地区出现。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依靠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可靠的感性’所感知。”^①

人类和人类社会正是在类人猿逐步学会劳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过程中演变而来的；作为人的智力、人的认识也是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49页。

在这一过程中开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由于实践不断地暴露、揭示事物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的矛盾及其本质，也就不断地提高了人们的智力即思维能力。这样，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就不是感性的直观反映，而是抽象的思维过程。而费尔巴哈，由于只是单纯地从客体方面，即不是更从人的主观方面去理解、去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就完全掩盖了人、自然界的本质以及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真实关系。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把人类生活的周围的客观世界（即费尔巴哈所谓的“直观的”“感性客体”），首先看作是“人的感性活动”的对象，即实践的对象；而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也主要是“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关系。

马克思之所以把实践叫做“人的感性活动”，是因为，实践活动是人的肉体器官操纵着一定的物质手段，作用于一定的物质对象，这一活动过程是人们的感官可以感知的客观物质活动。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其它的缺陷和局限性都是从这发端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以此作为自己的基石的。这样，就从整体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之间根本的原则对立，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二）唯物主义阐明人的能动性问题的意义

马克思指出，由于旧唯物主义不理解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人的活动首先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所以，不仅不能对能动性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相反，还把人看作是受动的，而客体则是能动的。他们尤其强调人的“自我的受动性”。这样，他们不仅不能彻底

战胜唯心主义，相反，那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发展成为脱离、超越物质实在的绝对。实际上，唯心主义就是对人的能动性抽象化、绝对化、理想化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由于唯心主义“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即不知道现实的、客观的物质实践活动及其意义，结果，只是在抽象思辨的范围内谈论能动的作用，而真正现实的实践，却反倒成了这种唯心主义抽象发展了的能动作用的一个环节。主观唯心主义是把人们的感^性抽象发展的结果；客观唯心主义则是把人的理性思维抽象发展的结果。前者如贝克莱、休谟，后者如黑格尔。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之一，就是把能动的方面从唯心主义者手里夺过来，作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彻底剥夺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权。

马克思在这一条中用科学的实践观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的思想，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①“自觉的能动性”是人所特有的，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因为，自然界完全是不自觉的、盲目力量在发生作用，而作为社会的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追求某种目的性的人的活动。这种能动性最集中的体现在人们的实践当中，并受到实践的制约，受到物质世界的制约。要做一个彻底、完备的唯物主义者，就必须对这种能动性作出唯物主义的阐释；也只有从这种能动性方

^①《毛泽东选集》第445页。

面去提出、理解、论述问题，才能真正正确理解自然界和人，理解认识的本质和认识的对象，才能彻底战胜唯心主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

（三）对费尔巴哈实践观的批判

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这里的“思想客体”是指黑格尔的“绝对观念”。黑格尔把“绝对观念”理解为超越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实体。这种精神实体的自我运动，逐步外化为自然界、人类社会。黑格尔是以这种超越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思想客体”作为自己哲学的研究对象的。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的这种思想，主张把自然界和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一部分的人及其活动等“感性客体”作为他的“新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①。

费尔巴哈反对思辨哲学，主张研究自然和人这种“感性客体”，重新确立人在哲学中的地位，无疑是正确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但是，这个强调客观，重视感性的费尔巴哈，却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的实践活动。因此，当他用感性客体同黑格尔的思想客体对立起来否定思想客体时，连人的主体活动的能动作用也否定掉了。虽然，费尔巴哈有时也讲实践，他甚至认为唯心主义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只是从理论的角度提出并解决客观性和主观性，世界的现实性和非现实性问题，而不知道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问题，实践会给你解决。在真理的标准问题上，他还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起来，把生活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尺度^②。但是，从总体上看，马克思和恩格

^①《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84页。

^②参阅《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564—566页。

斯认为，费尔巴哈的上述提法，“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对费尔巴哈的总的世界观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只能把它们看做仅仅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①因为，他对实践概念的理解是不确定的，有时虽然也把实践理解为改造世界的活动，但在更多的场合，则是把实践看作是一种认识活动、理论活动，有时又把实践看成是一种生理活动，是一种消极的生活实践；有时，更把实践理解为是经商、谋利的利己主义的活动。他从人本主义出发，认为人的最基本的意向是利己主义倾向，是对幸福的追求。人为了自我保存而进行的各种活动不但是出于生理上的需要，而且也符合利己主义的原则。因此，他把这称作是“实践的处世原则”。他说：“直到今天，犹太人还不改变其特性。他们的原则、他们的上帝，乃是最实践的处世原则，是利己主义，并且，是以宗教为形式的利己主义。”^②因此，他就竭力抬高理论在认识中的地位 and 意义，贬低实践的意义，认为理论活动才是真正人的高尚的活动，实践则是一种卑污的自私的活动。所以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费尔巴哈对于实践“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这说明费尔巴哈依然没有克服资产阶级对“实践”概念的偏见，认为实践只是吃吃喝喝的利己主义活动，结果导致了轻视实践；并且很难同庸俗唯物主义划清界限。

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偏见，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他不是回避主体的人的能动作用，而是对人的主体的能动作用作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把具有能动作用的人的活动“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即把实践活动理解为是主体的人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

^②《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145页。

能动活动，又把这种活动理解为感性的物质活动，即客观活动。这种实践活动首先和基本的是生产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基础，因而也是人们认识的基础，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以及对于人们的认识都具有革命的、批判的意义。

第二部分

第二条是第一条中根本观点在真理问题上的具体化和展开。这一条主要是说明：人的思维是否有能力认识客观世界、获得真理，以及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两个问题。

关于人的思维能力是否能够把握认识对象，获得客观真理的问题，不可知论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唯心论由于否认认识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所以从这点上说，它实际上取消了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可知与否的问题。但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却认为他们心目中的或他们所理解的世界是可知的，从这点上说，彻底的唯心论也是可知论；但却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实践基础上的。旧唯物主义者虽然肯定了世界是可知的，并且是在批判唯心主义可知论的斗争中阐发的，但是，由于不懂得社会实践的意义，却没有科学地解决人的思维能力为什么能够认识世界的问题，也没有科学地解决真理的标准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在批判不可知论问题上的局限性，在实践的基础上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科学地解决并阐发了世界是可知的基本理论。

马克思在《提纲》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关于人的思维是否能够认识客观真理，“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在实践中实现了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一定历史实践的进展及成功，也证明了主观和

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后来，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想，指出：对不可知论“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第16—17页）

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更是以前哲学史上长期争论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虽然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主张只有正确地反映客观实在，与客观实在相符合的思想才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但是，由于他们离开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来理解人和人的活动，看不到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不能辩证地考察人们的认识，因此，在检验思想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的标准问题上，他认为，不证自明、一目了然的直观乃是真理的唯一标准^①。费尔巴哈有时还把真理的标准看作是“类的意识”，他说，“只有别人跟我相一致的地方，才是真的；一致是真理之第一象征，而这却只是因为类是真理之最终尺度。”“跟类之本质相一致的，就是真的，跟类之本质相矛盾的就是假的”。^②“我一个人所见到的东西，我是怀疑的，别人也见到的东西，才是确实的。”^③所以“类的尺度，是人的绝对的尺度、规律和准则。”^④总之，费尔巴哈没有把实践当作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把感性直观和“类意识”当作认识的源泉和真理的标准。

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基于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唯心主义解决，坚持一条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认识路线。坚持主观真理论，否认客观真理。所以，也就以不同的形式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只

^① 参阅《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70页。

^{②③④}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194、第173页、42页。

是在理论观念范围内，如把思想是否明确清晰，是否自相矛盾，是否对我有用，是否为大多数所公认等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显然这都是错误的。

在《提纲》的第二条中，马克思对哲学史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作了科学的总结。他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思维的此岸性。”而“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所谓“真理性”就是指在实践中人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达到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正确地反映了现实，即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所谓“现实性和力量”，是指具有真理性的认识，能够掌握群众（动员和组织群众），通过群众的实践活动，成为一种改造现实的物质力量，把理论的东西转变为现实的东西。我们知道，思维的“力量”，也就是“现实性”的表现；而且，只有具有“现实性”的思维，才是有力量的；而“真理性”的思维，是具有“现实性”的思维，因为，它是对客观现实必然性的反映为内容、为基础的。实践证明，思维具有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反映事物内在本质的能力（即反映现实）的能力；实践也证明，正确的思维（反映了现实的思维）具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成功地改造客观事物从而使思想本身得到实现（即成为现实）的力量。在这里，“此岸性”是马克思借用的一个哲学术语，依然是说明思维的“真理性”、“现实性和力量”。康德承认有离开人的思维而独立存在的“自在之物”。但是，他认为，由于人们先天认识能力的限制，只能认识现象，这是人们的认识能力所能达到的“此岸世界”；而“自在之物”的本质，是人类认识能力所无法达到的“彼岸世界”。显然，康德是在贬损思维的力量。黑格尔则相反，他肯定并推崇思维的力量，坚持意识具有“能动

的此岸的态度”。^①所以，他讲的“此岸性”，就是指能够消除康德所设想的在现象和本质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力量，使两者达到统一的能动性，因而也就是本质与现象统一的现实性。但是，在黑格尔那里，这个统一的“此岸世界”，归根到底是他的神秘的绝对观念。马克思在这里借用“此岸性”的意思是指，在实践的基础上，人们的思维能够透过事物的现象，达到规律性的认识。整个现实的客观世界都是可以认识的，都属于能达到的“此岸”世界。所以，“此岸性”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的角度说明了人类思维的真理性和现实性。

第三部分

这一部分是第三——九条，主要是批判旧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上陷入唯心主义的种种表现，指出其认识根源就在于不懂得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而不能把实践作为认识论的基础；而马克思则阐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并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

第三条 主要批判旧唯物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由“环境决定论”所引伸出来的英雄史观。阐明革命实践对改变环境，改变人的决定性作用。

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后来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以及费尔巴哈、都是“环境决定论者”。“环境决定论”尤其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和欧文唯心史观的突出表现。他们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改变了的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他们所说的“人”

^①《精神现象学》上卷，第147页。

指的是人们的意识、观点、性格和道德等，是人的精神面貌。他们所说的“教育”，不仅是通常所讲的学校教育，而且是指人的社会影响的全部总和。

当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把他们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时，提出了关于环境决定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的理论。他们认为，每个人的智力和感情生来都是一样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才能和品德之所以有千差万别，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但他们所讲的环境，主要是指政治、法律、教育、一般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不是指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等社会存在。其中他们特别强调的是法律制度和教育的作用，认为这两项有决定的意义。法律之所以也具有决定的意义，是因为法律采用奖惩手段来引导和决定人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面貌。

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周围环境决定人的精神面貌，要改变人的精神面貌，必须首先改变人的周围环境。这无疑是运用唯物主义原则说明社会历史的一种尝试。既然人是环境的产物，要改变人的品德，使之向善，首先要改变环境，在当时就是必须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反动腐朽的封建制度。显然，这是直接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作论证的。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是，当他们片面地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而环境又主要是法律和教育的問題，对于法律，他们没有进一步看到“立法者”即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法律的内容又是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的；教育者本人必须首先受教育，教育的内容、方针也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时，便得出了“意见支配世界”和“教育万能”的结论。这样，就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而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不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而是英雄天才创造

历史；不是群众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而是思想、观念决定（派生出）人们的实践。所以马克思说：根据这种学说，必然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高出于社会之上的少数“天才”和“英雄”，另一部分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绝大多数的“群氓”。“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①

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上述观点，后来被空想社会主义者所继承，并作为他们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方案的理论基础。罗伯特·欧文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制定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②

欧文认为，人们的性格是由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因此，一个人性格的好坏、善恶，不能由自己负责，而应归于形成这种性格的环境。欧文从这一基本原则出发，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批判，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实施方案作论证。他指出，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所构成的环境是一切罪恶和愚昧的渊藪。因此他主张，只有用代表真正的理性和正义的社会主义环境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环境，才能造就出身心健康的人。

但是，欧文却把社会环境决定人的性格片面地理解为是社会的道德、法律等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是由理性决定的。然而，理性意见是从何而来的？他们认为是“智者”、“天才人物”。所以，欧文和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一样，始终不能摆脱这样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即：一方面人是环境的产物，要改变人的性格就要改变环境；另一方面，环境又为“智者”、“天才人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8页。

物”的意见所支配。这样，他在历史观上就陷入了“意见支配世界”的唯心史观中。

费尔巴哈接受了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上述观点，所不同的是，他认为人天生具有依赖感，这是宗教幻想的基础。要破除关于宗教的幻想，可用启蒙的方法，而教育和文化在摆脱宗教和创造历史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针对旧唯物主义和欧文上述观点，马克思指出，他们的根本问题就是不懂得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性，即革命实践的意义。马克思说，革命的实践就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即主观见之于客观、改造客观的物质活动。这一活动之所以是“革命的”实践活动，是因为只有这一活动，才是改造客观世界、改变周围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满足人类需要的力量；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中，人本身（包括体力、智力和思想情操）才能得到改造。这种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和在这一过程中人自身的改造，无论就其深度还是就其广度来说，都是互为条件（当然实践是基础条件）、互相促进、同步进行的。这是人所特有的区别于动物的能动性的集中体现。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克服旧唯物主义的缺陷，达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重要的基本原理，明确地指出这种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他们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

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①毛泽东发展了这一思想，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②

第四条，主要批判费尔巴哈通过其宗教观所表现出来的唯心史观，阐明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消灭宗教的途径。

费尔巴哈对宗教进行了尖锐的唯物主义的批判。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用理性的火焰照亮宗教黑暗的本质，最后使人不再成为宗教用来压迫人民的幻想力量的俘虏和玩物，而是使人“从神学家变为人学家，从爱神者变为爱人者，从彼世的候补者变为现世的研究者”^③，使人成为生活在大地上的完整的人、幸福的人。

费尔巴哈之所以对宗教感兴趣，是因为在他看来，宗教“是人生的基础，是道德和政治的基础。”^④而他之所以对旧宗教进行批判，一是反对宗教的斗争，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最重要的精神堡垒；二是反对宗教，也就是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他自己对宗教的批判，就是与批判唯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结合进行的。他认为，黑格尔哲学是神学的“最后避难所”和“支柱”。

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就是说，费尔巴哈认为只有一个世俗的人间世界，根本不存在什么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76—7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72—273页。

^{③④}《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525、524页。

上帝、鬼神之类超俗的天堂、地狱世界。宗教是人的类本质的自我异化。上帝是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他认为，宗教的基础或者说宗教的心理根源，是人对自然的依赖感。而宗教的目的是为了摆脱这种依赖感。因此，人就设想自己的力量能够达到甚至超过自然。也就是说，人是按照人的形象创造出上帝，并对它顶礼膜拜，寄于无限的企望。所以，宗教世界只是人自己的本质的虚幻表现，是在人们的幻想中，对人的理性、意志、心无限扩张的结果。总之，宗教是从世俗的现实世界中分化出来的根本不存在的想象世界。这就是马克思在《提纲》中所指出的费尔巴哈的“宗教上的自我异化”和“世界被二重化”。

费尔巴哈“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揭穿了宗教的神秘外衣。“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就是说：将神学转变为人类学，将神学溶解为人类学”^①，以此作为自己哲学的任务。这无疑是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的。但是，从根本上来看，费尔巴哈的宗教观是唯心主义的。因为，他只是指出了“世界被二重化”的结果，却没有科学地指出“世界被二重化”的原因，更没有、也不可能指出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相反，对宗教产生的原因，还进行了严重的歪曲；并且，他批判旧的有神的天国的宗教，只是为了建立新的无神的人类之爱的人间宗教。这是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一个重要表现。

正因如此，马克思说：他没有注意到，在指出“世界被二重化”，“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以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这“主要的事情”就是只能用“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即基于社会基本矛盾而分裂为对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来说明宗教

^①《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22页。

的根源，并用通过革命实践解决（即排除）“世俗基础”的矛盾的方法和途径，从根本上消灭宗教问题。

宗教起初是被压迫阶级在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以前，对自然和社会的力量加于自己的无法解脱的苦难的抗争和叹息，是对自己未来命运和幸福的憧憬和幻想。后来，压迫阶级利用了宗教的特点，使其变成了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鸦片，它以争取对来世天堂的幸福的幻想骗取被压迫阶级对苦难生活的忍耐。因此，马克思在《提纲》的这一条中指出，只有从社会自身的矛盾，从社会分裂为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实践中，才能真正理解宗教产生、发展（“世界被二重化”）的深刻根源。因此，要彻底解决宗教问题，就不仅必须从理论上揭露和批判宗教，尤其要通过阶级斗争，通过革命实践推翻产生宗教的阶级社会。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上受到革命改造。”只有这样，也才能真正理解人和人类社会的本质；或者说，只有科学地认识了人和人类社会的本质，才能真正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宗教问题。

第五条，第三、四条是批判旧唯物主义唯心史观的表现，这一条是揭露旧唯物主义陷入唯心史观的认识根源：不懂得社会实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说明了费尔巴哈哲学的特点及其进步意义。

我们知道，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也就是费尔巴哈哲学创作生活全盛时期，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反动政策，而且在思想上竭力支持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宗教神学是封建制度的直接思想支柱。思辨唯心主义哲学虽然是资产阶级哲学，但它同封建

制度妥协的方面，却得到了封建阶级的赏识，成了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种间接的思想支柱。费尔巴哈是激进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不满意于封建阶级的统治，这是促使他从神学和思辨唯心主义的信徒转变为一个唯物主义、无神论哲学家的决定性因素。他认为，思辨哲学和宗教神学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他说：思辨哲学的秘密“是理性化和现代化了的神学，是化为逻辑学的神学。”^①因此，他宣布：“谁不扬弃黑格尔哲学，谁就不扬弃神学。”^②

正是为了批判神学和思辨哲学，费尔巴哈便诉诸“感性直观”。所谓“感性直观”，就是用人的肉体感官直接感知的，具有“感性的、个别存在的实在性”。他说，“真理性，现实性，感性的意义是相同的。只有一个感性的实体，才是一个真正的，现实的实体。只有通过感觉，一个对象才能在真实的意义之下存在——并不是通过思维本身。”^③这是不可怀疑的。从这样的存在、实体去推论它的必然性和本质性，比起从某种必然性和本质性去推论出它的存在要合理得多。因为，这个没有建立在存在上面的必然性，只能是一个主观的、被想象的必然性。费尔巴哈强调自然的可感性，揭露了肯定超自然存在的神学和思辨哲学的虚妄，提出了作为世界上事物本源的自然，是物质的、感性的、有形的存在，而不是由某种精神创造出来的思想。

费尔巴哈的这些思想自然是杰出的、唯物主义的，但却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这不仅因为他仅仅把自然界归结为多种具体的存在形式，没有对它进行哲学概括；更因为他没有把“感性”看作是“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而只看作是“感性的直观”。并且由于他认为，“只有在感觉之中。只有在爱之中……才有绝

①②③《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03、114、166页。

对的价值”的存在^①。所以他把“感性”、“直观”、“感觉”，“爱”看作是一个东西。因此他的“感性存在”，从根本上说只是引起生理情欲（即爱）的存在；也只有在情欲（即爱）中才感觉它的存在。这纯粹是一种自然生理过程，根本不是社会实践活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感性不是一般动物式的本能的、消极的生理过程，而是一个可感知的、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人总是生活于一定的实践活动中的。人类社会及其周围的自然界，以及人同自然界之间，都是一个实践的关系、过程和结果。离开实践的感性，只能是一般动物式的生理过程；离开实践，只从所谓感性上去谈自然和人，以及自然同人的关系，就依然是抽象的、非现实的。因此，尽管费尔巴哈把宗教的天国归结于世俗的基础，然而这个“世俗家族”在他那里依然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这不仅不能征服黑格尔的纯抽象思维的思辨哲学，而且自己在人类社会及其历史问题上也陷入非常荒唐的境地。这样，当然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宗教，不可能找到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也不可能懂得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发展。所以，恩格斯指出，正是这一点，使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这样，费尔巴哈便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从人本学的唯物主义出发，一接触到人类社会问题，便立即陷入了唯心主义，得出了最唯心的结论。

第六条，主要是批判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具体规定，即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阐明马克思唯物史观规定人的本质的观点。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是费尔巴哈在

^①《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67页。

批判宗教问题上的一大贡献。因为他揭穿了宗教的神秘外衣，使对宗教的批判同对唯心主义的批判结合起来，不仅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而且重新确立了人在哲学中的地位。但正是在关于人的本质问题上，由于他只诉诸感性，只把人与其自然属性联系起来，从人与自然的联系中去理解和解释人，不懂得实践，不懂得从人的全部社会关系中去理解和解释人，所以陷入了唯心主义。例如：他从“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一基本点出发认为人的主要本质或者人性的主要内容是他的自然属性。为了强调这一点，他甚至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说成是人本质，是“我的‘第二个自我’，是我的另一半，我的本质”^①。从而把人的生存条件和人的本质这两个不同问题混为一谈。用存在来代替本质是费尔巴哈方法论上的一个明显错误，是他的直观感觉论的表现。

从对人仅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理解出发，费尔巴哈又把人的本质作出只是生理属性或本能的活动。他认为，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②。但是，这种“人与人的统一”，并非指人的社会关系，而是指人的类关系。特别是两性关系^③。因此，他认为，要证明人是一种感性实体，只要指出人的情欲的存在就够了；而这种情欲并非上帝所赐，而是人的自然本身，是人的感性存在的标记。所以，“人的最内秘的本质不表现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而表现在‘我欲故我在’的命题中。”^④

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他又很强调人的本质是“理性、意志、心”。他说：“一个完善的人，必定具备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思维力是认识之光，意志力是品性之能量，心力是爱。理

^{①②④}《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530、185、591页。

^③参阅上书，第571—572页。

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人底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①他在这里所说的理性等，依然是指作为自然人的自然属性。因为他认为，精神活动是另一个肉体器官——人脑的活动，“精神只能导源于自然的本质”^②。这正是感性的、现实的人存在的另一种标志。

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及其规定人的本质的方法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因为，他是从物质的社会关系以外的孤立的单个人的角度，把人的本质仅仅看作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是仅仅不同于一般动物的纯自然联系的族类本质。不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概括，所以，他根本没有揭示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说：他“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③

基于人的理性、意志、心之类的爱与友情的“绝对本质”，人与人之间相互需要，也必需相互联系；而联系就是宗教。于是，费尔巴哈就“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他认为，旧宗教、有神的宗教是人的这种本质的虚幻的反映，人把自己的爱献给了上帝。把自己的感情寄托于上帝，力图在这种“太虚幻景”中寻求真理，寻找自己的幸福，实际上人们依然在苦难中。现在应当直接地在人与人之间的爱的关系中寻求真理，寻找自己的幸福了。可见，费尔巴哈无论否定有神的天国的宗教，还是企图建立无神的人类之爱的宗教，都是基于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唯心主义的

^{①②}《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28，65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页。

人的本质。

针对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上述理解及其对人的本质的规定方法，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是说，孤立的个人是不存在的。人的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虽然以自然界为基础，但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根据，人类之所以能在一定的自然基础上存在和发展，却在于人类最基本的实践——生产劳动。正是这一点，使猿转化成人，并在劳动中使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全部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物质的和精神的，并且是多层次的）。并且正是在这种关系中“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①这种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所以人本身就是实践的产物，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者，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现实的、可以理解的。离开以一定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去论证人的本质，只能是对人的自然属性的抽象，其结果必然是唯心主义的。费尔巴哈以及一切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从人的自然属性上解决人的本质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教训就在这里。

马克思在《提纲》的这一条中指出，由于费尔巴哈不懂得对人的本质只能从人的社会实践中，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理解，所以，必然产生两个错误。

（1）“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的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这里费尔巴哈的所谓“宗教感情”就是上面讲的理性、意志、心等理性的东西，即人的友谊、爱之类的感情。他撇开一定的社会实践，离开历史的进程来理解人的感情；同时又把宗教看作是一种基于情欲之爱的相互需

^①《毛泽东选集》，第260页。

要的联系，于是，这种感情就只能是一种永恒的“宗教感情”了。他认为，真正的宗教和人的感情是一个东西，而这类感情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自然的、永恒的。这是人的本质所在。

为了使他的这种所谓“宗教感情”的理论能够成立，他必须假定人们彼此都是孤立的、单独的个人、是“人类个体”，根本不生存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当中。这种感情是不属于任何社会、任何阶级的，因而才是自然的、永恒的。而这样的“感情”，这样的“人类个体”，必然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

(2) “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在费尔巴哈那里有“个性”、“种”、“类”三个概念。“个性”是指个体的特性；“种”是指一个氏族、部落、民族本身的共同点，即区别于其他氏族、部落、民族的特性；“类”是指一切人所具有的共同性。在费尔巴哈看来，人之区别于动物的，不仅在于人有意识（费尔巴哈坚持把人同一般动物严格区别开来），而且还能意识到自己是人这种“类”。动物则不能。动物没有另外一个同类个体，就不能行使“类”的职能，而人，即使没有另外一个人，仍然行使思维、讲话这种“类”的职能；思维、讲话是真正的“类”的职能。所以，人不仅把自己的个体性当作对象，而且也把自己的“类”当作对象。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意识到自己是人这个“类”中的一分子，不会丧失这种“类”的观念。这就是“类”意识。既然人自己意识到人的本质是理性、意志、心，因此，任何一个人在认识上应具有高度智慧，在道德上具有自我克制的能力，严守道德纪律，同时又具有宽大的胸怀，能够推己及人，实现利他主义。这就是费尔巴哈理想中的人的标准和道德理想。他认为，理性、意志、心与人的生命共存亡，它是人生的目

的，否则它就丧失了作为人的本质的基本规定。^①这就是费尔巴哈所说的人的“类”本质，即“类”的共同性。费尔巴哈的这种“类”的共同性又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就是说这种“类”的共同性是生来就有的。但却是看不见、听不到、不可感知的。因为可感知性就是人的种的差别，而“类是对个别个体的一视同仁”^②。正是这种“类”的共同性，把许多孤立的、“个类个体”“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成为一个类。这纯粹是从自然的、生物学的角度来理解人的共同性。如果不是这样，一旦进入社会实践的领域，这个“人类”就立刻分裂了，具体化了。

在费尔巴哈的“类”意识的学说中有一个重要思想，即人能够把自己个体的规定和作为“类”的规定区别开来：作为个体是有限的，而作为一个“类”则是无限的、完善的；人尤其能把“类”的完善性、无限性作为对象。这种对象化的“类”本质，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精神实体。这就是宗教的来源。他的“宗教感情”正是离开人的社会实践、社会关系，把人的“类”本质无限扩张、绝对化，进而对象化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离开人们的社会特性，孤立地考察人的所谓“类”，只能是人的自然属性。马克思说得好：“饮食男女等等也是真正人类的机能。然而，如果把这些机能同其他人类活动割裂开来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样的抽象中，它们就具有动物的性质。”^③

第七条是第六条的继续和深化，阐明由于人是属于一定社会

^①参阅《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26，28页

^②《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82页。

^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79年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46页。

的人，因而“宗教感情”之类也是“社会的产物”。

（一）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也是社会的产物，没有什么先验的、永恒的“宗教感情”。由于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离开人的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考察所谓人的“宗教感情”，把这种感情又归结为人的自然本质，就必然把“宗教感情”看作是永恒的。实际上，所谓“宗教感情”以及一切观念形态的东西，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随社会实践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毛泽东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①

（二）费尔巴哈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尽管在他的理论观点上是抽象的，超历史的，不可捉摸的，然而，实际上它却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即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又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则又属于一定的阶级关系，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体现者和负担者。所以，抽象的、超历史的（在阶级社会中是超阶级的）、不“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第八条，这一条是进一步从理论上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们的一切思想感情等意识形态（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能在社会实践中找到它们的根源。

为了从根本上批判费尔巴哈等人的上述错误思想，科学地解决类似“宗教感情”之类的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明确而又切中要害地指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是马克思的全部理论的主要之点。这就是说，全部人类社会生活都是以实践为

^①《毛泽东选集》，第809页。

基础的；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物质生活本身就是实践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强调，人们要生存，要从事政治、文化、科学、艺术等社会活动，必须首先解决吃、穿、住的问题，即必须解决从事其他社会活动所必须的物质资料问题。为此，必须首先进行生产活动。所以，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所谓人们的社会存在，主要就是指的以这种实践活动为基础、为内容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此外，还有在生产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并为生产实践服务的解决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实践（在阶级社会中，是阶级斗争的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活动。这后两种实践活动也是适应生产实践活动的要求和发展而发展，并直接决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不仅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基础，而且是社会精神生活的唯一源泉，是精神生活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①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一切意识形态，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科学的还是荒谬神秘的，都会在社会实践中找到它们的根源。“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这里不仅说明即使神秘主义的东西也能够在社会实践中得到解释，而且也说明，这些神秘主义的东西，也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在人们的意识中被根除掉。

第九条，这一条可以看作是对上述几条（3—8条）思想的小结，指出，离开社会实践，靠直观不能认识人类社会的本质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31页。

其发展，当然也就不可能建立科学的社会历史观。

“市民社会”是马克思当时借用的一个术语，用以表达不同于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指的是各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①但是，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以及后来的黑格尔、费尔巴哈，都不是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借用这一术语，并对它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指出，经济基础是受生产力制约的。“市民社会”其所以产生于十八世纪，这表明当时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财产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说明经济关系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已经非常明显了。

“直观的唯物主义”是相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而言的，指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不懂得社会实践活动意义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虽然是众多的个人活动的场所，但决不是这些众多个人机械凑合的集合体，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活的有机体，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每个人都是这一活的有机体中的一员。这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活的有机体及其历史发展，也决不是任意的，而是被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状况所决定的。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所以，社会的本质是建立在一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人们的活的有机统一体。对这种社会本质的认识，只有如实地把它看作是实践的，因而通过社会实践，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在社会实践中才能正确理解。

但是，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由于不懂得社会实践在全部社会生活，在人们认识中的作用和意义，不仅不理解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进行单个人的直观，甚至不理解任何的单个人都是和整个社会实践分不开的，都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结果就把人看作是众多的单个人的个体，把社会本质理解为由单个人所拼凑起来的机械集合体。费尔巴哈关于人的“宗教感情”，关于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以及法国启蒙者的所谓“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都是“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也就是对人的价值的直观）的表现和结果。

以上六条，贯穿一个基本的观点，即实践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出，科学的实践观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了有机统一。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是空前的，是这一崭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之所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同一切旧唯物主义从原则上区别开来。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

第四部分

《提纲》的第十、十一两条可作为第四部分。这两条是对整个《提纲》的总结，也是对新旧两种唯物主义本质特征的科学规定。

第十条：指明了新旧唯物主义对立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

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如前所述，“市民社会”这个词当时是表示已经摆脱了封建农奴制的财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即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旧唯物主义哲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上，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与旧唯物主义相反，“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在这里讲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是一个意思，指的是，不是以那一个阶级为标志的社会，而是统一的人类社会；也不是社会中的那一个阶级，而是社会化了的人类。这样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人类”，就是无产阶级所代表的所要求达到的消灭了剥削、压迫，消灭了阶级差别的人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即新唯物主义）是对基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的概括，反映的是代表社会化大生产发展方向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这一条，揭穿了一切旧哲学所标榜的超阶级的骗局，指明在阶级社会中，哲学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是一定阶级的利益、意志的哲学概括。

第十一条：马克思在这一条中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的实质，在于给哲学提出了一个崭新的任务：不仅要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哲学家们”指的是以往的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决不是说，旧哲学在社会实践中不起什么作用。实际上，任何哲学都是适应一定的实践任务而产生的，在阶级社会中哲学总是一定阶级的哲学，并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哲学革命”是“政治变革的前导”，对任何哲学都是普遍适用的。但是旧哲学，不论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由于不懂得理论来自实践，把实践排斥在哲学之外，因此，他们也就只能给自己提出说明世界的任务，而不可能给自己提出用实践去改造世界的主张。例如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他们当然是要用自己的世界观去改造封建社会，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但是，他却认为要达到上述目的的途径只在于对封建制度和维护这一制度的宗教神学进行理性的批判，对“愚昧”的群众进行“启蒙”，使人恢复天然的“理性”，这样资本主义的“理性王国”就会到来。这实际上是把改造世界的任务归结为说明世界；至于改造世界的主张，他们根本不可能提出来。霍尔巴哈就这样说过：人若是想改变世界的秩序，那只不过是一个叮在马车车轡上却以为自己在指挥马车行进的苍蝇而已。黑格尔哲学也是如此。虽然在黑格尔哲学中有许多关于实践及其同认识关系的深刻论述，但他却把实践看作只是“绝对观念”的体现，只是在思辨的王国里翱翔，始终没有超出只限于解释世界的窠臼。至于青年黑格尔派，他们虽然也批判了宗教神学，竭力标榜自己是一切的无情批判者，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

出的：“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说他们仅仅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那末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①费尔巴哈也不例外，他虽然批判了宗教神学，宣扬了无神论、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他也没有给自己提出改造世界的任务。他的唯物主义直观性就说明了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费尔巴哈“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②

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第一次把科学的实践的观点引入哲学，当作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公开宣布自己的哲学主张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服务，从而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本质特征——在实践基础上的实践性和阶级性的高度统一。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提出，为了实现人类真正解放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把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4、47页。

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①在《手稿》中，马克思又明确地提出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问题。在《提纲》中马克思又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思想，从整体上异常鲜明地强调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只主张改变世界，反对解释世界；相反地，它认为科学地解释世界正是革命的改造世界所必需的前提。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②

总之，马克思在第十、十一条里，把自己的哲学同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对立，归结为它们的阶级基础和理论出发点（作用）的根本对立，这就从哲学的社会作用和阶级性高度统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实质。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说，《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重要界碑。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③这应当是我们理解《提纲》第十、十一两条思想的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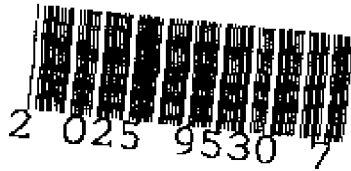
参 考 书 目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5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恩格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②③}《实践论》第268、261页，《毛泽东选集》第268、261页。



斯选集》第1卷，第20—85页。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29—135页。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59—273页。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

思 考 题

1. 马克思同旧唯物主义者对实践的理解有何不同？科学的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是怎样的？
2. 怎样理解马克思的真理观？
3. 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在人的本质问题上有何分歧？根源在哪里？
4. 为什么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5.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6. 怎样理解《提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后 记

本书是由《〈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教程》编写组集体研究、分工执笔编写的。

各章的编写人员是：前言、《1888年单行本序言》，方永祥（安徽师范大学）；第一章，李殿斌（河北师范大学）；第二章，吴锦琴（华中师范学院）；第三章，张浩（河南师范大学）；第四章，刘培学（山东师范大学）；《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方永祥。

全书统稿人（以姓氏笔划为序）：方永祥、张浩。

参加本书讨论的同志还有：李进（上海师范学院）、王爱敏（烟台地委党校）、肖扬（安徽师范大学）。

本书编写组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